

中德文化叢書

論德國民族性

黎耳著  
楊丙辰譯

論 德 國 民 族 性

DEUTSCHER VOLKSCHARAKTER

維廉·亨利·黎耳著

楊 丙 辰 譯

von

Wilhelm Heinrich Riehl

übersetzt von Yang Bing-dschen

中 德 學 會 編

中德文化叢書之八

DEUTSCHLAND - INSTITUT

Peiping

Schriftenreihe Band 8

1939

## 譯者序

每年一到了暑假，我總想讀點書或翻譯點書；民國二十六年暑假開始時偶爾在此地中德學會見到了這本小冊子，因為著者底名姓，我曾在德國文學史上見過，並且我也還曾讀過他所寫的幾篇短篇小說，所以當時我就把這本這小冊子借了出來，以備暑假中隨時閱讀。

在家中，我把這本小冊子匆猝地翻閱了一遍，覺得牠雖是說的德國民族性，其實是敘述了整個德意志民族各方面之現像，並批評了其是非好歹，得失利弊的，所以舉凡民族之風化、道德、政治、經濟，以及鄉土、農民、市民、家族、勞働等問題，無一不是這本小冊子中的重要篇章了，況且著者之眼光，見解，言論，更能獨闢蹊徑，健康踏實，絕對不崇尚空談，不為左右各派成說成論之所左右，力主為人生而人生，不為主義而人生，務要使人民在政治與文化等方面之生活，得其天然妙趣之發展，一以民族之特質特色，民族所固有之生活律則為本，並且他還主張「民族科學」、「國粹政策」勸

那些談政治、經濟、社會、國家的人們，去實地觀察人民之實況，然後再來作它們的政策政見。所以由這兒看，這的確是給我們指示了另一條觀察民族的路子，給我們打開了對於民族的另一種眼界了，而這一種觀察的路子，這一種眼界，却是近代歐洲著作中之所罕覩，是真正能與我們有所裨益的，足可為我國現正鬱勃奔騰之民族將來建設之借鑑的。爲了這個原因，我纔來決斷翻譯這本小冊子，而在汗流浹背的溽暑中，並在城外炮火連天，佟趙二位軍人死難的時期中，我竟把這本小冊子翻譯了出來。這便是這本小冊子譯文底來源了。

至於說這本小冊子底著者維廉·亨利·黎耳氏生平歷略怎樣，這我們現在可以根據阿多爾扶·巴台爾斯氏 (Adolf Bartels) 所著「德國文學史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一書中之記載約略敘述於下面的：黎氏係於一八二三年生於萊茵河畔之比布利禱城 (Biebrich am Rhein)，自一八五四年在德國南部巴燕邦首都民欣 (München) 城內大學充當國家經濟學教授，後復充當文化史教授，自一八八五年充當巴燕邦王家國民博物館館長，以及巴燕國前代殘存藝術作品與古物保管總長，於一八九七年卒於民欣城內。



在著作方面，黎氏是很有貢獻的；不過他的著作，我們可以分文藝與科學兩批。在文藝的一批上，他發表有六部短篇小說集及一部長篇小說，即一八五六年發表「文化史短篇小說集」，一八六三年發表「舊時代故事集」，一八六七年發表「新短篇小說集」，一八七四年發表「到犄角之外去」，一八八一年發表「在宴息的晚間」，一八八八年發表「人生之謎」等等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題名：「一個全人」，是於一八九七年他歿後纔行出版的。在科學的一批上，他於一八五九年發表「三百年之文化研究」，此外他還著有一生最大傑作「民族之自然史」，一種德國社會政治之基礎，這部書共包括四本，是他於不同的時期中寫了出來的，就是一八五一年發表「平民社會」，一八五三年發表「鄉土與人民」，一八五五年發表「家族」，一八六一年發表「德國之勞働」，而於此四本書之外，更於一八六九年發表「漫遊記」，一八五七年發表「伐爾慈地方之人民」二種著作。

黎氏這兩批著作，一方面使他成爲一有名之詩人，一方面使他成爲一至偉大之學者，因爲他科學方面的著作，便是建立「民族學（Volkskunde）」的著作，是研究了民族在物質方面，風化道

德方面，精神方面，以及社會方面之生活條件的，而他這科學的著作，也還是他文藝著作底基礎，因而更在這一方面，闢創了一種新派別出來，就是所謂「文化史派」之短篇小說。他的科學著作，言論精警澈底，而意見純良，文藝著作，純潔質朴，聲調色彩俱皆準確逼真，而富饒天然雅趣，並且更能真正表現德意志之民族性，真正表現它們那深邃的情感，真摯的信仰，堅真的坦白直率，它們那剛正的偉大，不動不搖的堅忍，以及它們那愛自由，愛獨立，愛真理的志向種種美德，因有這一種情形，所以他的文藝著作簡直可以說是他所創的民族學底註腳，可以說是二者互相為表裏的。並且爲了這個原故，我也還把阿多爾夫·巴台爾斯氏所寫的一篇的很長的，評論他文藝價值的文章特行譯了出來，附印於本書之後，以便增加讀者對於他的認識。

現在我們眼前這本小冊子，雖說是呂斯來氏所作的一個節本，然而黎氏底見解究竟怎樣，我們由這兒已可看出個大概來，並且我們由這兒也可以明白，德意志民族在以往歷史上屢仆屢起，始終未曾爲敵人所毀滅的原因，雖然不一，然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却仍在精神方面，仍在民族性堅強優良，種種美德之所使然，因爲它們自來都不甘受壓迫，不甘爲人之奴，深知愛國愛民族，深知犧

牲，深知爭勝爭強，所以無論一時怎樣失敗，而終要有翻身時候的。譬如說歐洲大戰，德國和他的三個與國力敵世界三十三國，抗戰五年之久，雖不能不終遭失敗，然而其失敗的主因，係物質窮竭，而非其民族精神之失敗。所以大敗後的德國，到現在不過二十年，竟又躋於強國之列，沒有敢來再欺壓它們的了。我們看到了它們這宗精神，這宗事實，真使我們心內不能不起無限的佩服驚嘆，使我們不能不覺得它們真是其它民族底好榜樣，而不能不採取它們這宗好榜樣，好精神了，尤其是在現下的時期！

最後，這篇序，爲甚麼到了現在纔來寫了出來，這是因爲要印行這譯文的中德學會同商務印書館商議印刷問題竟至延遲至今的緣故，不過這個問題如果到現在仍尚未解決時，恐怕我還要再拖懶些時日哩！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一日於北平

楊丙辰

# 內容目次

譯者序	一
關於民族之科學	一
關於神土	四
森林 德國民間的一種生活要素	四
現代 以上腦力腫症的病態現像	九
德國人之二重性格	一六

關於農民……………一三三

農民之政治的與社會的重量……………二三

農民之習俗風尚……………三〇

民族藉農民之刷新……………三七

農民在貨幣經濟影響之下的劣化……………四二

關於市民……………四八

市民之軋轢天性……………四八

卑劣性市民……………五四

政治上的市民……………六二

關於家族……………六九

婦女之民族的使命·····	六九
家與國·····	七四
民族底風俗禮法·····	七九
家族情意與繼承產業的風尚·····	八四
關於勞働·····	九一
論勞働之榮譽·····	九一
工廠工作·····	九七
效果，利益，盈餘·····	一〇二
民族勞作·····	一〇八
出版者附言·····	一一五

論維廉·亨利·黎耳氏……………一一九

# 論德國民族性

## 所謂「關於民族之科學」

應爲一切關於國家哲識之起點的，乃對民族之研究，而非對各派國家學說之研究。以前時代之政治家在精深澈底之學派方面平均定然俱皆不敵以後之政治家的，然而以前時代之政治家却亦有其特長，而其特長即在能每日以一付益加清醒之眼目觀察各具有其特殊實體之民族生活，因而至少能有一種實際把柄，以爲它們政治手腕之展佈，這種特長只是到了後來，纔缺乏罕見起來了。所以說，所謂關於民族之科學，在今日仍尙屬國家科學上並未有其存在之一種輔科。由這兒看，這能不是一種奇怪的現像麼？民族，爲一位政治家用以嘗試他鑄造才幹的質料，民族之生活，爲他以一位施展治術者之身分應予以規律與秩序的天然元素，而他竟不過問。一種政治科學怎



樣會能可思議呢，如果這科學不以研究民族之天然現像爲其初步之根據時？因此我敢斷言，在各大學中人們作關於所謂「民族科學（Wissenschaft vom Volk）」之講習，在國家之考試中評定民族科學之試卷，這個時期將來必自會實現，以彌補這個缺陷的。

所謂對於民族之研究，這因民族應視爲一種社會的與政治的人格機體的原因，並非順路藉瀏覽之便，即能辦得到的；這需要一個整個人生之充分的研究精力。只是用真正的，不疲不懈，到一切民族階級裏去的些搜探旅行，用一隻醒覺的眼目對出現於日常生活中，萌動於一種輿論裏的各方面情感中的一切微小難見的徵兆的覺察，人們漸次纔能有獲得關於民族裏一定的些組團底政治與社會性質的澈底論斷的能力。

詩人克來門斯·布倫塔納（Clemens Brentano）關於大自然生活之神祕會說過一句極瑰奇的話，即謂大自然觸處之生活生機向一位步越大地之人物只是在他對牠觸處懷有一腔誠懇欽敬之熱情，歸依仰慕之悃忱時，方能以青睞悅視「親切和藹地去睬他的。」詩人對於自己曾有詩句說：

「因我精誠慕愛一切之生命，

于是不畏避我，一切界域物體內之神之靈！」

這樣民族生活裏的神祕亦只是要在我們果能欽敬重視「所有一切」生命生活時，纔能親切和藹地來睬我們，向我們展示牠們內裏的祕藏妙蘊，而牠們界內的神與靈方不致畏避我們，竟要來惠臨我們了。然而如果一個人不知欽敬仰慕所有一切生活生命，而僅只注重民族內之生活生命，以便適應它素所習染的那些學說學派上的成見偏見之現成方式時，那各界域內所具有的神與靈便要逃避它，而它亦便要如同葛德氏 (Goethe) 弗士德 (Faust) 一劇內所說那位庸俗大學助教瓦格那 (Wagner) 一般，當在他同大師弗士德 郊外遊步時所見那支魔王所變的龙犬 僅能見其為一支大龙犬，而不能見其為魔王之化身了。

## 關於鄉土

### 森林，德國民間的一種生活要素

即使我們不再需要木材了，那我們仍是不能不用森林的。德國民族需要森林，猶如人類之需要酒，縱然最後僅只是藥店老闆把四分之一奧穆（Olm 譯者按此係德國從前之一種液量名，約合一百三十七立脫爾零四分至一百五十五立脫爾〔Liter〕）的一點足數應急備要的酒量存放在他的地窖之內的話，那也終究是得需要的。因為我們既用不着焦枯的木柴，以煖熱我們人類底外皮，然而那綠瑩蔥鬱，充滿汁液生機，一方一片立於大地之上的木材，為煖熱我們當前存在的人類底內心，却就愈加重要，而不可一時或缺了。

在我們德國的木材（Waldörter）中——任何一位曾漫遊過德國山嶺的人物，都知道，在

德意志的祖國裏是還有許多真正林村的——給我們德國民族保存着極其古老的殘俗遺風，不僅僅在牠們那蔭影方面，也是在牠們那天然鮮旺的光華方面的。不獨森林地帶，即沙崗沙丘，水澤池沼，廣野莽原，巖石冰山，一切荒蕪荒涼，以及沙石地帶，悉屬業經開墾耕種之田野上的一種不可缺少的補充。我們爲我們慶幸吧，因爲在我們德國尚有這樣多荒野的地方。「一個民族在力底方面的發展，應行具有的一種現象，就是這民族同時能含有至不同方面的發育發達。」一種全然在教育中磨得光滑，處處都雅周到，飽饜富庶安逸的民族是一種死民族，給牠們所餘剩的，除掉連同牠們那百般千樣的華麗美好如同古代淫蕩國王撒達納帕爾（Sardanapal）自行鑠炙外，不會有別的了。奸滑老練的城市居民，產穀富足地域裏的肥飽農民，這可以說是些現代底人物，但是貧苦的沼澤農民，粗野頑強的森林農民，荒寥孤寂，而自負自豪，既富口碑傳說，而又善歌山歌的阿爾盆山上的牧人（Alpenhirt），這是將來底人物的。關於社會的學說，就是關於人類天然不能均齊劃一的學說。甚至在這宗才智與職業之不能均齊中，反而是社會最高彩華伏根之所，因爲不均齊便是社會上那層出不窮，無盡無休的生活力底源頭。如同海洋能保存處於一種粗蠻元始狀況裏

的海邊居民健康鮮旺的情形一般，這樣森林對於內地居民也是發生同樣的効力的。因為德國有這樣多內部土地，所以牠所需要的森林也較英國加多。真正的森林村民，森林技士，樵夫，與森林工人，便彷彿是我們這些地耗子族類裏的強健結實的水手似的。如果你們想要把社會平成磨得一樣光滑，染成一樣色彩的廳堂文化時，那你們就把森林拔除，把山嶺剷平，把海洋開塞了起來吧！我們瞧得見，全盤福樂茂盛的地帶，一經將有防護効力的森林刼除，便要怎樣會受到暴發山洪破壞一切，以及熱風焦炙的損害。一個民族必不能不萎凋滅絕的，如果這民族已不能向那居住於森林中的寒苦野民回手攔握，以便由它們那裏掏取單純直率，天真未鑿的民族性底新生力時。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大批森林，便是應當視同一個沒有重要海岸的國家一樣的。我們應當保存我們的森林，不僅只爲使冬天爐火給我們不致冷涼，無柴木燃燒，乃亦是要使民族生活裏的血脈煖熱，快樂搏動的，乃亦是要使德國終究爲德國的。

德國林村居民較比純粹平地村民差不多一律皆有一種愈加特殊鮮旺的，精神的特質。反之在平地村中肥滿之富足，顯著於習俗道德重大腐化墮落之傍，亦是較多較甚於林村中的。森林村

民往往非常貧寒，然而毫無產業，而心懷不滿不平之貧民却多半都住在純粹平地村裏的。後者在國民經濟方面，前者在社會政策方面，悉行具有較大之重要性。森林農民更爲粗野，更好打架尋毆，然而也更爲快樂；森林農民往往容易變成一個有天才的無賴漢，而那笨重如豬的平地農民反而容易會變成了一個毫無良心，視財如命的吝嗇人的。古代民間俗習服裝之保存或消滅，這個對反與山地和平地之對反相適應之程度並不若與林地和田地之對反相適應之程度之甚，如果人們也把生草及灌木的荒地，水澤池沼，以及其它荒野的地方都算作林地的話。森林地帶是民間藝術底爐竈；森林農民同着林中的禽鳥們歌唱它們自己的歌調，還會經過久常的輩代的，如果那與森林地帶接壤的平地村民底民歌（Volkslied）早已就寬裏廣裏消沈寂滅了時。一處沒有森林的村莊是和一座沒有歷史的建築物，沒有紀念碑，沒有藝術品的收藏，沒有劇館和音樂，總而言之沒有洵情適性的和美妙美善的激勵啓發的城市同其乏味無趣的。所以說，森林既爲青年們底體育場，而亦可爲老年人們底饗宴堂。那麼這種種情形底重量不是至少也要同經濟方面的木材問題一樣同其高低的麼？在平地（Feldland）與林地（Waldland）底對反中，德國社會多方面開展與色

彩煩雜上頭的那最單純與最自然的前階段，俱皆一一透了出來，換句話來說，就是透露那一大批最特具，最本色的民族性，而這民族性，便是我國民族柔韌堅強，返少復生的能力所潛藏之所。

那實在是一種離奇的錯亂知識之舉的，如果許多人們在十九世紀的德國還要把根除森林的事情視爲一種地利之開闢，視爲一種國內拓地植民之舉，彷彿必得這樣，我們纔能把那伐除了森林的地帶爲文化所招致了來！在我們今日的德國人們，並不視森林爲一種荒蕪無用，且阻碍橫生，入其中，便不能不作向外逃竄，到清平田塍地面上來的心思的地帶了，我們現在是認森林爲障護我們最本色的民間習俗風化的一帶垣圍藩籬的。因此我竟稱呼森林爲「地力之野開發（die wilde Kultur des Bodens）」以與「地力耕作之熟開發（der zahme Feldbau）」相對映，根除森林，這在我們今日的人們並不叫作開墾新土，以增耕田，我們是只認這宗行動爲一種耕作上的方式與其它的一種相交換。誰要是僅以純收穫之利率爲標準，去評斷土地耕作之價值時，那他自然纔要令人們斫伐林木，以便開闢林地爲耕田了。可是在我們這一批子人們，對於土地耕作之各不同方式的評價，却並不僅以牠們在貨幣方面的價值爲標準，我們是要以牠們精神方面的價

值爲標準的。開發地力與土壤耕作上頭的夥雜方面，便是我們社會中個人組織色彩花樣繁盛豐夥上最深邃的源頭之一，而因之亦便是我們社會方面生活力豐厚宏深上的源頭的。

森林在開發地力的行動中，是表現着貴族的色彩的。因爲森林底價值之在森林之性質方面，是較甚於在牠的利益與造作方面的。所以只是富足殷實的人家纔能培養林木，甚至有時最富足的人家爲培養林樹還要會覺出所具有的財力仍尚不充足的，因此國家以全國財富總體之資格，纔可以有理由說是國內第一位與最大的一位森林產業家的。不過培養林木，要說是僅爲的是現存的人類，那這未免要淪爲一種寒類貧氣的叢籬林業（eine armseilige Heckenwirtschaft）了！高大的林木，是人們爲將來的人類所培植的。因此森林第一便是國民經濟學上的對像，其次纔是私人經濟上的對像的。

## 現代文化上腦水腫症的病態現像 (Wasserköpfe)



我們德國無論大小各城市都會，如果已將我們德國城市之特質特色俱皆消失，那我們便可以說，這是我國文化上所患的腦水腫症的。患腦水腫症的人們並不少見地會表現一種早熟的，極端激動興奮的精神生活，這是我們大家共知共曉的事實。然而我們可不能竟由這一點情形裏推斷，最厚肥脹大的腦袋便總是最聰慧與最有生命能力的腦袋了。

我國各較大城市都會人口不可思議的迅速激增，患腦水腫症一般的膨脹擴大的現像却並非因人口生產過剩，乃是移居人口過多之所招致的。而所謂移居，乃純粹係指鄉間與小城市裏的人民向大城市裏的移居投奔說的。可是移居與投奔到大城市裏來的人們大多數全是孤身客人，既無固定職業，又無自己的家業，樣樣都是要想在大城市裏擷取幸得。它們原本全都覺得在家鄉前進過於遲慢，所以纔懷着大野心到大城市裏來，以為在大城市裏不耕不種，即可大事收穫了。決定只是少數的人們纔能獲得了它們所夢想的這幸福，大多數的人們都是在大城市裏鬼混些時，覺得無甚希望而又退去的；可是退去的只管退去，繼續奔來的仍一樣多，甚至還要加倍，而也仍是一樣地退去。所以我們大城市底膨脹龐大，實在非因定居戶口之增加，乃是因潮水一般漂來而

又流去的無定的人羣底增加之所使然的。卽此惟一的一件事實已經足可使社會政治家觀之驚愕的了。

鄉間的農民多半都是一家大小團聚一齊生活的，而城內的居民很大一部分反而都是各另生活，各另謀生的了。城市裏這一宗各另生活，各另謀生的趨勢，會愈加增進的，如果由較大點的城市更進而發展爲簡直大城市大都會時。卽因這一點情形底不同，便在城鄉之間劃出了很重大的溝壑，這溝壑可惜絕對並不見減輕，乃是眼望着日見擴大。城市居民數目之激增一經與鄉間農民數目之增加相對比，因上述情況之故，便要很喪失其社會的重量了。一位政治家如果忽略遺棄了關於社會因素的考量討究，那大城市民衆之激增，便要爲我們的全盤文化發出一種真正破滅的重量來了。在由鄉間移居大城市的人們底數字中爲我們全民族生活上的個人發展所潛藏的一批危險，遠超由國內遠投國外的人民底數目中所藏的一批危險的，可是這遠投國外的人們底數字當然是要使經濟學者聞之驚悚的了。

大城市底延展開大，既這樣龐然無度無量，又這樣狂然無方無式，所以我們城市上頭那應視

爲一個特殊的，個人個性一般的物體的特徵便自然要自行終止的了。任何一個大城市都是要變爲一個世界大都市（Weltstadt）的，這換句話來說，就叫作和世界一切其它大城市都一律一色，一律無異，甚至連國籍不同一點特質也都還要擺脫去了的。在大城市裏沈潛着使世界一切齊一大同的世界主義（Weltbürgertum）。世界大都市，俱皆是些五方雜處，包羅萬像萬有的人文淵藪，舉凡道德習俗與藝術方面的善惡好歹，美妍醜怪，以及全部文明顯赫的歐洲工業製作之精，各種技術之神之妙，無不色色俱備，樣樣皆全，所以我們簡直可以說世界各大都市都是一部一部關於這三方面萬彙萬物紛然雜陳的巨大百科大全書（Enzyklopädie）的。關於世界都市的這一個思想中所也含有的那高貴豪華，我自然也知道，不曾錯認了，並且我也不曾錯認了，尤其那創造的與發明的工業天才，那商人們底商業商務，總而言之，凡一切物質方面的勤作經營，將會由這些百科大全書中拔取何等豐饒的收穫的。因爲凡屬人類匯聚成了大集團的地方，工作必定繁茂，利益必定成熟，那麼國民經濟學家觀之，自必欣然地心滿意足了。可是羣衆匯聚得最膨脹的地方，並不一定總會有社會底健康發達的，這也是其它一方面在那山農寂寥的院落中一樣地不能會尋得

的。所以即在人類羣居麤聚之發達中，也是需要一種均中和諧的度量。我們知道，我們的文學界裏自從有了百科大全書之編制之後，紛然雜陳，而缺乏根本觀念的百科大辭書主義（*Encyklopädie*）之精神也竟隨之而流入我國。可是這一種精神却並不是一種發生過優良效果的精神。我們大城市底這巨大百科辭書，和牠們那一次連續一次的板本將來也必定是要走這同一命運的道路的。人們令家中青年的子弟們到大城市裏去，爲的是好叫它們開開眼界，認識認識世面。可是大多數的青年子弟們所帶了回來的，並不是成熟的研究，乃僅只是些迷醉，惑亂，和百科辭書主義之枯燥無趣無味。一個人，若是要一眼把一切的都看了過來，那他結果是毫無所見的。大城市裏的居民無須出外遠遊，它們在它們所住的那大城市底城牆內即可以最舒適安樂地觀覽世界，它們令世界到它們的眼前來，替代走向世界中去。然而却只是遠出外遊，纔能成熟人們底精神的，因爲人們對於大自然，對於民族底生活，對於人類熙來攘往，經營製作種種情形的觀感觀念，都是在遠出外遊時一步一步地領略得來的。誰要是在大宇宙裏如同在一部百科全書中來回地尋求反掀，那它之所獲得的，便不能算是它由奮鬥，由血汗中之所得來，所以便不能入骨入髓，對它們那獲

得便也不會保持得許多。

我們德國底偉大人物，尤其是藝術與科學界上的偉大人物們，大多半都是顯著於較小的城市，和來自鄉間的。斂聚精神於一點之上，乃是造成偉大人物的基礎，而這一種的斂聚却是在大城市底百科全書主義中很難找得出的。如果鄉間優越的才士藝人得以成熟完結，那人們自然也要把它們搬到大城市中來，可是這樣我們便屢屢會經驗，這樣的些才士藝人一到了大城市中，便彷彿是被置入了一種精神的恩俸休職狀態中的了。

中古時代的藝術活動，其發展之特殊，却遠超我們今日中等城市中藝術活動之發展。當時的那些藝術家見聞閱讀並不甚廣甚多，然而它們反因此而更能直接由它們性靈底深處，以自行創作了。近代許許多多藝術與作風上，都在厚厚地佈滿了大城市那徽霜病癘。全歐洲的劇館都因至高度大城市的觀衆們對於劇情奢華化並對於鋪排佈景爭奇鬥異，花樣愈翻愈新，愈翻愈怪的情形，的無厭要求，以便壓飭它們那大城市色彩奢侈淫逸的心目，所以便全都成輩成代地破壞了去。在德國現在已經是使真正好的小舞台沒有立足之可能了，因為德國社會上那些庸俗的人物

們也是曾經到過巴黎，到過維耶納和到過柏林各大都市，以為自己，便是見過大市面，開過闊眼界，從此以後便只要以大城市的眼光衡量那處於固陋寒顛角落裏的小舞台，而要瞧不起牠們了。可是這一宗小舞台當初却實在是曾為一種純潔得多了的，深帶有國民性的戲劇藝術的投奔培養所的。

以上所敘述的惡劣情況，如果還要向下追究的話，那我們便還有許多話可說，並且更可藉以瞧出，在大城市裏的音樂與繪畫二種藝術界裏也是照樣顯出這一宗惡劣分解的影響的。大城市裏一次一次所開的藝術展覽連帶那裏面陳列的誇耀誇示的作品足殼證明那迎合大城市裏觀賞民衆麻木無靈，輕浮猥劣的心理的趣味作風了，這趣味與作風在一切藝術上都要求一種浮誇虛妄的藝術。社會上那宗這樣有意義，有趣味的家庭音樂與宮室音樂却會久長的時間因受專尚誇大排場的大城市的音樂演奏，並因受在這些大城市裏方得尋到了它們本來窩處，而所謂多才多藝的藝術作風底重量高壓，便幾乎被完全地壓了下去。

## 德國民族性上之二重性

如果一個人自偏西的中央德意志走了來，在那兒他處處瞧到至窄狹的地帶上擁擠着民族與土地上這樣繁雜的駁雜情形，並且在那兒人們每走一邁輪 (Meile) 遠的道路，便彷彿轉過了一個拐角似的，眼簾之下頓時現出一片新地帶，一些習俗性質俱有所不同的新人物，因而更到了位於多腦河 (Donau) 與阿耳盆山 (Alpen) 之間，延伸得很長很長的巴燕國 (Bayern) 的高原時，那尤其惹他注目的，便要是那裏那一組一組民族，一帶一帶地勢上的層次廣遠，面積延展的情形，換句話來說，便要是小場所上那宗無孔不入的愈加細緻徹底底缺乏了。因此如果人們要把這兩方面情形不同的民族與地勢搜集了來，作為民族誌 (Volkskunde) 與土地誌 (Landeskunde) 上的材料時，那關於前一方面所敘述的人物鄉區，便須要編成許多許多十二開的小部頭堆積在那兒，而關於後一方面所敘述的人物鄉區，便僅只能編成兩本至三本二開的大部頭書

冊了。兩方面情形底不同，又譬如，關於前一方面，往往僅只用一個下午的時間，作一次散步的遊行，便可從實際上把各處細碎的人地相反的情形對比一下了，然而關於後一方面，欲作實際人地的對比，則非整日整天的行程，而不可能。這話並不是要說，彷彿伊賈河（Iller）與銀河（Lahn）之間的一帶永野與丘陵之地缺乏着形成得尖銳顯著的特徵，而渾然一色的平康無別，牠們確係有牠們顯著的特徵，不過牠們這特徵只是面積廣袤宏闊而已，然而恰恰因此，這種特徵竟得藉以保存了自已的堅實質樸性，而使之不得破折。

過去的時代，尤其中古時代，整個時代的活動都是屬之於形勢個別化到最細末處的地帶地區的。那麼將來的時代或許是要屬之於形勢生得廣闊與宏巨的地帶地區的麼？德國全國地勢上形成得最特獨各別的地帶地區底主要地方，即：土靈根（Thüringen），赫森（Hessen）以及上部與中部萊茵河（Ober- und Mittelrhein）之兩岸，始終皆滯處小邦國氣像（Kleinstaaterei）之中，而未能得以擺脫的；德意志三個至偉大邦國底領土，即：奧國（Österreich），普路士（Preussen）巴燕（Bayern），自古以來，悉係以地形巨偉的地區為限界底劃分的。德意志民族藝術生活上的兩



個至重大的中心點，一個建立在伊撒 (Eiser) 河畔的寬廣高地上，一個盤踞在施普來 (Spree) 河畔低窪的沙土地上；在這樣的地點上，是中古時代永不會，並且永不能有力量建立起來為藝術重鎮的大都市的。時至現在，巨大的工廠工業與鐵道底世界交通，都又特愛搜尋遼遠的，始終一樣的大平原，以為發展之基了，而俄國那無邊無盡，千百里不見人煙的荒野草原便更為地勢紛歧的西方國底懨悶幻想力幻想之資了，牠們這幻想力以為已經在神思中瞧見了一次新的民族大遷移 (Völkerwanderung) 底幽暗陰影遠遠地由那些地帶裏走了上來了。

德意志民族性上固然有一種二重性，但這二重性却絕非和北德意志與南德意志之對反相吻合一致的。這二重性是建立在經一律以一種方式所統一，而又多方面所分立的土地與人民之二重情況上的。平民社會裏的這統一欲望與分立精神上頭的二種推動力量底開展，在這二重性上也是顯著於地理方面與民族風俗習慣方面的。然而我們祖國之南部與北部在國民性方面却呈示一組一組絕對類似之點；而與此相對反的，則為中部德意志。如果人們將民間那宗偶然的情形，裝飾和外面的衣物等除外，那麼東部弗里斯 (Ostfriesen)，斯來斯維·賀爾斯坦因 (Schles-

wig-Holsteiner) 下部撒克遜 (Niedersachsen) 麥克倫堡 (Mecklenburger) 彭買 (Pommern) 等處人民和舊巴燕 (Altbayern) 鐵羅耳 (Tiroler) 斯泰耶邁開 (Steiermärker) 等處人民近似的程度却較二者和上部撒克遜 (Obersachsen) 土靈根 (Thüringer) 萊茵弗郎墾 (Rheinfranken) 等等中德處所人民近似的程度遠甚超甚了。在德國底北部與南部還有些民族依然是舊日全體完整的樣子，可是在德國內地原始民族底子遺殘餘俱已四零五落地星散，而互相攙合雜亂起來了。在北部與南部直到如今仍還有純粹的農民，純粹的村落，然而間或也有純粹的城市。在德國中部農民與城市的特質往往多已泯滅，而互相混攪，於是農民乃帶有城市色彩，小城市底市民反帶有農民色彩，在上百的小城市和大村莊上，人們簡直不能確切斷定，牠們是更屬於此或更屬於彼的。純粹農民的區域在那兒僅只微小的去處方能偶而一見，彷彿被灑到了那兒去的一滴零落的水珠一般，竟成爲那一帶地面上的一個例外，證明上面所說那一宗情形是實在的。像亨保 (Hamburg) 柏林 (Berlin) 維耶納 (Wien) 一類的世界大都市，是中部德意志所絕不能會有的，而亦然不能會有的，便是像位置在阿耳盆山 (Alpen) 脚下和大海邊岸上的那些純粹的農村。在

北部與南部，人們差不多還知道，甚麼是四民的階級，而在中部，人們對於社會機體枝節的瞭解力幾乎快要完全消滅的了。上部與下部德意志（Ober- und Niederdeutschland）的地面上純粹的民間土話仍尚存在；然而中部德意志底民間口語却已解體，而煙消霧散了。在南部與北部，特別的是嚴峻的宗教信仰，仍尚一律根深柢固地潛伏民間，而北邊彭買（Pommern）地方的人民視羅瑪教皇（Papst）爲一位真正的假基督教徒，是和鐵羅耳（Tiroler）地方的人民視馬丁·路德博士（Doktor Luther）爲一位真正的假基督教徒的程度，都是一般相等的。可是在內地宗教的信仰却就混攪不能一色了，而這一派對於那一派容忍漠視的心理，甚至在下層的老百姓方面，幾乎也僅只殘留着教會生活上頭那殘破消殺的色彩了。

在北部與南部直到現在還住的有些孤獨寂寞的人們，未曾受有文化影響的民族組團，在中部則所有曲徑小路俱已開通，而任何一所孤單的宅第便都是臨着寬廣的大街道的。在前面所說那一些地方上人們簡直還可以作探幽搜奇的旅行，在後面所說的這些地方上，一個行人每走十步，便會被一個其它的行人絆倒的。如同居住在南部荒寥寂寞的瀨河上游峽谷（Oberlechthal）和

許多其它阿耳盆山峽谷裏的居民一般在幼年的時期離別家鄉，投奔到大世界裏去，爲的是求食異鄉，以便晚年以一位成功者返回安靜的家園，以終天年，這樣北部海邊居民也是成千成百地懷着同樣的目的往來於各海港之間，奔逐於各海洋之上。關於古代居住於斯干抵納維恩（Skandinaviern）的諾爾曼（die Normannen）民族們曾有一種傳說，說它們作它們那遠征海上的壯舉時，是曾用拈鬮的方法把青年的民族選拔去了百之一的，同樣的情形也曾見述於古代瑞士國的遊行傳說裏，這樣的巧合真駁奇異的了。

北德意志與南德意志的民間情形在許多外表上彼此頗有所不同；但在核心與性質上兩方面却是令人可驚異地相接近的。南北二部民間情形底這宗近似，亦俱至強銳地由山川底形勢裏反映了出來，這是與中部德意志的情形相背反的。蓋在北部與南部地形之構造，則悉屬規模廣大宏偉之一流，譬如廣袤的平野，海洋，巨大的江流，崇高的山峯等等；反之在中部德意志，則小丘小嶺以及面積狹小的平野平原至斑駁地綜錯交雜着，再就是一些石質地質構造極形駁雜的中等連山列山，和一批至爲夥多的細小湖沼河流。中部與南北二部底地形地勢既這樣，而與之相適合的

民間的情形，則在一方面乃係大規模的聚合，而在其它一方面，則為破碎散亂的雜居了。如果一位研究家曾示及德國好改良革命的民族精神與各地方地質上的地形構造極中肯綮的關係時，那它這樣的比較却實在並不僅只是一種妙趣的戲言，因為這確係有些與實情相合的。一個地方顯然曾經太古世界裏的天然大變革最瘋狂地展佈了牠們巨大的威力，而將至不同的岩石層上下左右地在地面上亂行投擲疊壘，那在一個這樣破裂的地方上自然連民族底生活也要很早地就破裂零散了起來的，可是向這些裂隙裏，近代的教育便著落了裏頭去，於是隨着這教育便一同地也帶來了對這教育上頭的革命產物的感受性，反之其它一方面在形勢分列得廣袤巨大的地點上土著的，成大批大部分地處於閉塞狀態中的老百姓們却就要非常柔韌堅強，寧折不屈地僵化在它們那特質特色之中的。中部德意志各種族間之所缺少的，乃是那一種排除一切其它情形的偏頗專一性，由這一種偏頗性，許多巨大的民族組團竟都發展成了一種一致的，柔韌堅持着的畸人，怪特的天才家的，而這一種偏頗專一的情形，在這中部德意志各種族所居住的土地上地質地理的構造方面也這一樣地缺乏着的哩。

## 關於農民

### 農民之政治的與社會的重量

德國民族裏潛伏着一種不可克服的保守性的權威，一顆鞏固的，雖經千百變遷而仍能依然如故的核仁——而這權威與核仁便是我們的農民。農民是我們民族裏真正奇拔特殊的部分，是任何一個其它民族都不能拿出一種類似的部分來，以與之相對抗的。受過教育的人們底心性，是保守的，因出於理智的理由，農民底心性，是保守的，却是受着習俗禮法底影響的。在十九世紀底社會鬥爭中，農民曾演出了一種較比大多數的人們所想像的還要重的角色，因為農民造成了一道天然的防堤，阻當住了法國革命的學說向德國下層民衆裏的氾濫湧溢。只是農民們惰性的反抗，纔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五月之役救護了德國各邦王公底寶座。人們說，這次革命到了王公底寶

座前便止住了；這不是完全對的，其實是農民在各邦王公底寶座前止住了的。方纔所說我們農民那一種懶懈淡漠的心性並非偶現的性質，這尤其可以說是由德國農民最深的心曲中之所湧流了出來的。農民在我們祖國裏所有的一種政治重量，是在歐洲其它少數國家裏纔能再見得到的；農民是德意志民族底前途。我們民族底生命一時一時繼續不斷地得以在農民階級上恢復精力，返還少壯。如果我們不令農民中的貧困份子過於增殖，那我們對於工業界裏和文學界裏的無產階級便勿須過事恐懼的了。在農民階級裏是視經濟政策爲一切國家治術底頂尖的，並且誰要是在這一點上不從習俗禮法和工作方面去研究民族，這換句話來說，就是從社會政治方面去研究民族了，那它用它那全部的國法連一隻狗也誘不出角落外來的。官僚主義的國家自來所犯的最大過錯，都伏根在這樣的些國家完全錯誤地理解德意志民族底性質，並在它們忘了「國家保守的權威潛藏在農民階級裏」的最高原則。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給我們實際上證明，它們那宗見解多樣地不對。然而即在革命黨派方面當時也還未曾將農民底政治與社會的重量認識了出來，所以要說從事於農民特質之研究的話，那它們也還是隔離得非常之遠的。一位民衆領袖如

果能曉得怎樣降服農民，那他可真要是一位令人可怕的民衆領袖的，這樣它不僅能把民族裏的眞正大多數弄到它的一邊去，不僅徒爲人數方面的關係，就是物質與精神方面的威能也都要爲它所把握了過去的。

惟獨在農民階級裏，古代德意志民衆狀況底歷史方得如同具備了活的體格一般，高高地突入現代的世界裏來。農民並不會學習過歷史，但是農民底本身却就是歷史的。農民外一切其它的階級俱已由牠們那元始的圈環裏走了出來，擺脫去了它們那太古的特殊情況，而換上了使一切光滑都雅的普泛的文化，可是只有農民們還仍是存活於它們那滯滯澀澀，不光滑，不文明的特質之中，成爲一種固執的，獨立的社會上的構形，雖然也不能說，數千年以來絲毫都未曾爲那一切的文化文明所觸動。因此研究農民底狀況，便叫作研究歷史，農民底習俗禮法就是一個活的文庫，一本有無上價值的史料的書冊。

眞正的德國農民即在自然科學研究家底眼中已經就要視爲德國人種上的歷史典型的。在城市居民，體格上以及精神與習俗上的元始鑄形俱已發展或甚至也消散成了單個人物底典



型，至多也不過能發展爲一家人物底典型，而絕不能全城全市皆成爲一個典型的。然而農民體格上的特徵却是成羣成組地按照它們所居住的場所與鄉區而不同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此一鄉還能發現全是些一色腿部較長，軀幹頗高的人物們，在彼一區反而所見的，又悉屬肩背較爲寬廣，而軀幹短矮的人們了，並且這宗情形尙更屬代代相傳，歷千百年種式仍能純潔，而絲毫不變的。誰要是想從歷史方面很忠實地繪畫中古時代的人物時，那它便得不到鄉下農民處尋求它的模型 (Modell)。由這一個情形中，人們便可完全瞭然，那是十分合於自然的了，爲甚麼普泛德意志主義的造形美術家在人們于其它情形上以定形定式爲思想與構造的標準的程度較比我們今日少得多了的一個時代裏平均都把它們所造的人物底頭面悉行予以這樣典型地同樣同式的對待，這是因爲那時全部人民底體式還沒有徹底發展到了愈加依人而異的面容面孔的地步的原因了。可是至於說這宗情形直到今日仍尙存在於天真未鑿的些農民之間，這個狀況會引我們更到一個進一步的事實上頭來的。在所稱之爲文明的，教育化的社會裏，人們底存在，人們底操作，尤其其是俱已形成了人各自異，個人個體底色彩的；可是農民底存在與操作，皆係組團性質的，全階級

底總體性質的。漢斯 (Hans) 耕田上的引犁，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是和孔慈 (Kunz) 並無二致，並無甚麼可異的，然而可異之點，則在此千萬人之中，皆係此一人與彼一人完全一樣地引犁，一樣地生活與思想，只是這一點纔是使它們大家底操作成爲世界史性的偉業，並且因此而竟是將一種這樣沈重的分量投入了我們全盤政治與社會生活底秤盤裏去的。

在文明的，教育化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底風格，而這風格便是要劃定每一個人底方式的事物。可是農民方面，這宗風格並不在農民，而是在種族，鄉區，和國土上頭的，換句話來說，就是在它們的土語，它們的熟套語，它們的格言哲語，它們的歌曲上頭的，而這一宗風格便劃定了那一大組一大組的民族集團。農民這鄉土風格却又是一塊歷史了，這是那農民們足毅頑強地堅持，不肯放棄了的。

與農民們這宗頑強守舊的性質相連繫的，還有一種極巨大的自意識，就是對於它們社會價值的一種自負自豪的得意知覺。元始狀態未破的農民並不以自己是一位農民而感到羞恥，反之與它們的心理上更相接近的，竟要是去卑視任何一位未曾披上了農民們所常穿的那件短褐

(Kittel) 的人物了。在德國（就是在法國的地帶裏也是一樣地）有些地方有種風習，在一些宗教祭日，農民們便要拿農民服裝去給那神像聖像穿上的。農民底短外上衣（Bauernrock）是農民們所最珍貴視之的大禮服，甚至爲一位神聖用，也是它們覺得足穀珍貴的哩。

農民們視頭疼病爲最輕微的病症，因爲用頭腦的工作，是它們覺得是最易，最勿須要的一類工作的。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風波凶險的時刻，鐵羅耳（Tirol）地方的農民們曾聲言，它們勿須「大人先生們」底協助自然也能會把事情辦妥了的，如果人們只用准許它們幹的話。真顆真粒的農民絕不妒羨體面的人物，他尤其總要視他爲有點虛浮放蕩的。歷史上會報告些各式各樣的農民叛亂，用這宗叛亂那百方百樣被剝削虐待的農民要想改造它們的命運的；但是農民底一種志願，由它們的階級與職業裏退出，去充當體面的人物，拋棄了它們的耕犁，爲的是要去譬如說作一種吃利息的人和資本家或一位巴黎國家閒人等底安樂消停業務，那這樣的一種的志願在德國農民却是從未聽見說過的。反之城市內社會低層裏所包藏的社會暴亂底危機，其推動的彈力恰切皆起於一點之上，就是總是較低微的階級與職業妒忌較優高的階級與職業，並且總是在起着也

欲達到它們那好位置的野心，這換言之，就是地位較低微的工人總是以它們的職業爲恥的。工廠工人，手藝人，並不是不儘意在增高它們工作底利益——這也是農民底志願的——它們的目的在終止爲工廠工人，手藝人，它們以它們的身分爲可恥，它們也志在爲一位縉紳先生的。在這一種卑劣的，一直連續到社會最高層裏去的妒忌心裏，却潛藏着社會的機謀詭詐，搗亂煽惑上頭至不堪，至不道德的因素。農民直到現在還不識這種妒忌的心理，它們的腦子裏直到現在仍爲它們那階級精神上的高尚傲岸之所充塞，這堅貞傲岸當初也曾爲手藝人之所具有，並且也曾是令牠成爲較比今日往往所能有的情形還要光榮得多，能幹得多了的事物的。七堡 (Siebenbürgen) 地方的撒克遜國人 (Sachsen)，如果要表示對於一個人的敬意時，那它就要說：「他也是我們一流的——一個人的 (Et iss äser ener)」。如果着市民短外上衣的人輕蔑地由肩背上向着農民短褐的人瞧了下來時，那這一位尋常登時便有一句極中肯綮的話，張口說給它聽的，就是：「如果沒有我們農人的話，那你們便要沒吃的了。」在這一句話上農人應當永久終止着，這是一句光榮的話，農人大可以之自豪自負的。

## 農民之習俗

「土地耕作之方式」多半確定「農民之習俗」；然而農民之習俗却是一支收藏着民俗上許多極其古老的珍品聖物的木箱。農民因它們工作方式之使然，竟得以保存了我們民族鑄形上僅僅輕微地，令人難以覺察地漸次推移轉動的歷史的基礎色彩，而因此便在它們工作方面向國家自身之發展上也是和市民一般地奉納了它們的捐稅，不過農民底捐稅，我們可以說是間接的，市民底捐稅可以說直接的而已。

人們曾說，我在我從前的著作裏把關於農民墨守舊俗的詩歌敘述得過於有田野風味，過於有誘惑力了，但是就光亮處仔細一瞧，這些詩歌却盡係有悲愁的來源的。牠們都是些殘破的，只是在中古時代那農民蹂躪榨取，農民脂膏血肉上頭存放着的碎片零塊，並且只是沿着鄉民因受這蹂躪榨取底影響而竟延展到我們今日的時代裏來的愁慘窮困，沮喪抑壓，精神桎梏束縛的諸

種難堪難忍的情況纔得以保存了下來。這簡直要令人們覺得，彷彿好詩好文章自來都是要由壓迫與窮困中產生的了！可是一直到如今仍能這樣頑堅地保存了德國農民於民族習俗色彩上林木一般清新綠瑩的詩韻裏的事物，却並不是政治上的狀況，這尤其可以說是它們工作上的方式底結果的，這方式不僅未嘗爲封建制度之所負載，甚至反倒是牠們幫助着負載了這封建制度的，並且最後這宗方式還是把根子生在了土地底本質中與民族聚居上頭的最古老的狀況中的。

如果要說中古時代那宗既不少惡毀誹謗了文學，又不少惡毀誹謗了德國農民的異端邪說是對了的話，那中古時代最自由的農民，譬如北海（Nordsee）邊岸上那些頑固的下部撒克遜人（Niedersachsen），其次瑞士國人（Schweizer），再加上南部高山地帶巴燕和奧國的鄉民必定早已就會最澈底地棄絕了祖宗以來所傳流的那古老遺俗了。然而任何一位日爾曼考古學者却都知道，在這些地方恰切是會尋到關於我們最古的民族文化遺物的最豐富的寶庫的。但是中部德意志各小邦小統治區域上從前多半這樣不自由和這樣被壓迫的農民反倒是有至高度的變易性的在它們那習俗之中，並且正當封建制度鼎盛的時期，許多萊茵河畔（Rhein）的鄉村即已開

始城市化了。

真正農民意習俗是有三個源頭的，就是：宗教，家庭和工作。宗教習俗，家庭習俗，工作習俗即在動盪無定的市民社會裏也是最能持久不褪色的，牠們彷彿在未織成布的羊毛裏即已染上了顏色的了。

巨大的經濟危機最能澈底破壞農民意習俗。鄉間服裝和廬舍建立底歷史在較近的時期往往皆以穀價底歷史為轉移。可並不是直接爲了那一種原故的，就是爲了農民會愈加富有的，如果穀物底錢值增加的話（這因爲我們可以瞧得出來，最富有的農民往往是富有忠於習俗的守舊心腸的）乃是爲了市場底轉變會逼迫它增進，甚至或許會逼迫它完全改革它的農業經營方式的。萬一遇到了萬分不得已時，它會把它們的牧場犁成了耕田，把公有的田產分散給大家耕種，施行人工飼料培植和廐舍飼養法；這樣舊日的農具，舊日的倉庫和廐舍便也要不能足用了，於是這人便不知不覺在田地上，在家庭與場院裏竟成了一個另樣的人，因之最後竟也要在服裝與習俗裏，在哲言哲語，詩歌與傳說裏改變了樣兒的。尤其是最能持久的祖產，就是所居住的廬舍，真正

的農民幾乎永不會變動的，如果不是一場火災來逼迫它，或持久增長的穀價來誘引它作此事的話。因此凡是要想更改農民底習俗的人，它便不得不從農民「工作方面」去下手了。政治與社會的進步派底宣講者，它們妄想直接勸告農民更改它們的習俗，却多半反而使農民們更加固執強項起來了。反之十八世紀傳播苜蓿草與馬鈴薯於歐洲的使徒們（Klee = und Kartoffelapostel）和十九世紀之農業會社所置入鄉民習俗裏的一種革命，其影響農民底心性却較同時政治方面的農民新改造深切深遠得多了。

從其餘方面說，恰恰居處北部沿海沼澤淤泥之地（Marschland）與南部阿耳盆山裏從前政治方面最自由的農民簡直連土地經營上所說的「三度輪替耕種（Dreifelderwirtschaft）」的方法都還未曾發展得到。它們因為都是些畜牧家，所以僅從事於牧場之經營，至多也不過進而更從事於種植秣草之經營，並且自然甚至它們都還完全是滯處於自古以來所傳流的焚燒青草茂盛的軟泥地帶和林地上的樹木，以便開墾之用的半野蠻的文化狀況之中的。可是這宗文化狀況反而更鞏固了它們的風俗習慣，雖然它們具有一切的自由心思。況且海邊上的農民早已就被



拖入了有鎔解習俗力量的商業之中去，因而在世界開通的精神上便遠超它們居處內地的同胞了。可是雖然如此，它們却始終未曾城市化，它們土地底本質，耕作和聚居底方式把它們攔留在農民底情況之中。居處北部海邊上的農民成輪船地向英國倫敦城（London）底市場運送飼肥了的牲畜，以工廠制度燒煉磚瓦，然而並不為外來的文化浮華所動，而仍毅然不以為恥地棲息於蘆葦的房頂之下。

在這一宗房頂之下，觸處皆是太古的遺習遺風，觸處皆是所敬奉懼忌而與這宗遺風遺俗有關的成百的神祇鬼靈，雖然人們在較為殷實的戶主底庭院裏穿過牛棚和其它畜類底大廣間之後或許竟能會踏進一間十分優美地收藏着一小批置放在珍貴的桃花木架（Mahagonigestell）上的書籍的屋室。但是土地耕作底方式却是勝過了一切の書籍。沒有一個農民所過的一種生活是會較比南部高山裏自由舒適，而家道富裕的畜牧家所過的一種生活更加富有靜野風味與更加富有詩韻詩趣，而又這樣精美地為最古的風俗所支配着的。誰要是硬說，在我們阿耳山上的大農院裏和在牧人底廬舍裏，只是壓迫與人民萎縮，不能得其發育的原因纔使古代民族的習俗得

以成了這樣牆壁一般牢固的了的，那它至多也不過僅只瞧見過一個石印的阿耳盆山牧人婦女底照片，而不是會瞧見過一個活的哩。但是卽在這石印照片上亦可向它示明，在它們這一幫人民底體格上，民族所具有天然鮮旺的力量所顯著的程度，是由一種屈辱奴隸底狀態中所絕不能產生了出來的。可是如果要說北部泥澤地帶的農民雖經海上的貿易之所接觸，而仍能很忠貞地保守它們種族底特質與習俗的話，那南部高山之地的農民對於藝術與手藝誘引的影響尤其要受同樣的魔考的。前部阿耳盆山 (Voralpen) 上的木刻家和提琴製造家都是手藝人的，況且大多半還都是些藝術性手藝人，甚至有時竟是些真正的藝術家；但是它們在大體上終究仍要爲農民的，因爲阿耳盆山上牧場與草地底偉大是勝過了工人底工廠的，並且雖然世界著名的阿默鄉區的露天耶穌受難劇 (Ammergauer Passionspiel) 之演出多半皆爲藝術家與手藝人，然而從前人們却總是不得不稱呼這戲劇爲農民劇的。環繞於四週，而一望無際的那阿耳盆山上的牧場綠野，連帶覆蓋於其上的那碧落長空，俱皆落入劇場中觀衆底眼波裏來的，會向它們說，這是爲了甚麼緣故了。

至於說，使農業耕作上的基礎形式總尚能這樣多方面並列存在，這却並非可以隨人類意思之所強爲，這是農民底本質之所迫而使然的。

上面所述種種情形，在這兒歸總起來可以說：農民因它們工作底方式歷來總是保持自己的地位爲守護我們國內種族與移居地，習俗與語言所含藏的最真確的民族遺物的人物的。農民向我們所表示的民族人格（Volkspersönlichkeit）底基礎色彩爲靜止的，拘束的，在天真的天性裏活動着的。可是這一種靜止並不是死板的；這只是從比較上說的靜止的；因爲在農民習俗顯然僵凝不變的外皮之下仍然有一種輕微難察的生命，並且也完全暗自在寂靜地不知不覺地向前推動着這堅貞守舊的民族層。

農民底工作与農民底習俗是民族人格上的骨幹。人們固然瞧不見骨幹生長，但是牠們却實在暗自在生長的。農民以它們工作底方式堅強地一致團結着民族裏性質較爲活動變易的機構的勳勞，這我國語言上的慣用法也很欣然地承認，因爲在這慣用語上甚至也直接把農民習俗與民族習俗，農民土語，農民服裝與民族服裝視爲有同一意義的名詞的。

並且不僅僅爲民族研究家，這宗堅貞守舊的農民性是我們最本色，最固有的文化古物底具體佐證，即教育文化中的人物也全都不覺地在觀感鄉民的舉動中獲得了鮮旺返少的能力的。大詩人釋勒（Schiller）論大自然與文化相對反的情形曾說：「農民是我們教育文化中的人們之所曾是的，並且是因爲我們在它們的身上可以能一比量，我們因一種完全別樣發展的民族工作所獲得和所喪失的是甚麼，此外更因它們同時給我們所反映的，是一種在小處孤立的，對於自己有把握而不迷誤的生活，所以對於它們的工作與習俗的觀視爲我們便會有一種天真拙樸的藝術作品底涼爽的與開啓人類心胸的印象魔力的了。」

## 民族藉農民之刷新

如果要說農民在理智與情感修養方面不敵所稱之爲受過教育的人們，那它無論如何在精神強壯，筋骨堅實的方面總要超越了它們的，這據我看起來，却也是一種精神的優越點了。

在對於我們精神文化狀況的評判上，人們尋常都忽略神經上所具的力量。所以那恰切便是古時的詩人，畫師，和彫刻家勝過較近的人們的一點了，就是因為它們的身內全行具有一種十分異樣的，鮮旺充盈，豐富健康，而未經剝折破敗的神經力量，這是我們今日精練醇化的批評意識，我們已經增進了的理智與情感生活之所不能及的。一位莎士比亞 (Shakespeare)，一位彌協爾安格勞 (Michelangelo)，一位韓德爾 (Händel)，一位賽拔斯提揚·巴哈 (Sebastian Bach) 底天才，全都在他們那未經破壞的神經力充分含量中樹立着基礎；即關於葛德 (Goethe) 那一個思想也是常令我們感到爽適的，就是那一個以為這一個偉大人物要有多樣強健神經的思想，可是所謂近代的「天才性」，往往決不會是別的，不過神經系上的一種病態的，興奮過度，易感易激，而不自然的現像而已。即連關於社會方面的那一批空妄的言論思想，其根基之潛伏在我們城市居民以及無產階級者頹廢破裂的神經系統中，也頗為不少的。針對我們社會黨派的工人那神經力弱，絕望於自己的抵抗力的平等主義，有一句舊日農夫底格言說：「男子是獨自個兒的！」 (Selbst ist der Mann，即我國：大丈夫獨往獨來的意思) 這句話裏面却就藏有精神的力量了。我們之父之

祖，他們的境遇較之我們今日的境遇惡劣得多了，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較之我們今日也加倍地無可告慰，但是他們却決不會想起絕望來的——（社會民主主義底學說，便是個人對於個人男子性的絕望，而弄成了一個系統的）——可是他們還有強健的神經和那農夫一般，並且也和這些人們一樣以上帝底佑助打開了難關，貫徹了自己的主見。農夫尋常並沒有人們所想像的那麼筋力強健，它們只不過骨格粗壯和身體笨重較甚於筋肉底靈活，筋肉底彈力性而已；但是農民却有未經破壞的神經系，而因此便是有棉韆的堅忍性的。因了這一層原因，它便不能明白，為甚麼城市居民竟要出外散步，因為城市居民多半只是為了蘇緩疲憊的神經纔作這事的，並且農民還是認出外散步為愚狂行動中最大的，因為它們自然要覺得工作就是強健神經的方法的。在這一點上看起來，農民多樣愉快幸福地立於那壓榨不堪，神魂俱憊的城市工人之前了，因此那便是好現像了，如果許多後來的農民之子轉入工業階級，因為這樣一則可以給城市居民輸入新的精力，一則可以保存鄉區不致因人口過剩，過度分裂田產，並可不致使與此不可分離地相結合着的，衰疲人們神經系的「馬鈴薯生活」得以出現。

人們知道，德國農民自來皆承襲有頗不小的一批天賦趣才，它們這趣才在實際的事務上竟又爲這樣多機警詭詐之所配合，簡直不稀少地會使一位心眼最多的律師也要吃驚的。但是所可奇怪的，是這種趣才也竟要會離棄了那農漢，而發生不出來的，如果他一被置身於他所不習熟的異樣的環境之中時。一到了這宗地步，那甚至他所柔韌堅強操持着的懷疑心理，他在判斷與決斷中的審慎顧慮態度往往便也不能爲他的支柱了。同一的一位農漢，他在其它的時候如果不曾把一塊克魯彩（Kreuzer，譯者按此係德國之一種輔幣名）在手中反了五六個過，決不肯收受的，並且他也決不肯把他的財產付託與一位他同他不曾在一塊已經吃過了一斗之數的鹹鹽的人的，同是這樣的一位農夫竟會以一種不可思議的輕率疏忽把自己棄置於一位奸詐的人販子之手，如果他一旦既經徹底地與他舊日的環境破裂，而決心要到新世界裏去走一蹶的話。彷彿一種幽暗不測的險惡命運在吸引着他的一般，他多半毫不加以思索地投身於海外移民的大洪流之中，一隻雪盲的雞子似地，他在那素所不習熟的新情況底幻光裏東倒西歪地踉蹌。但是他的脚下一經又踏着了實地，他一經又得以開始在新家鄉裏建樹舊日的習俗，那舊日它們那實際的眼

光，那趣才，那有良好效果的懷疑心理便要都會又給他復返了回來的。向海外遷移的農民最多的次數是沒滅於行途上，向海外遷移的城市居民最多的次數是沒滅於殖民地。德國農民所具有的堅忍持久的性格使德國的農民成爲生來的殖民地人民，這宗性格奉獻了它們到這宗偉大的，有世界史性的使命上頭，更使它們成爲把德國精神，德國風化底旗幟扛到世界各處去的人物們。德國的農民差不多到處，凡屬在國外的疆土上它們能安置它們的犁頭的地方，都能獲得當地人民底敬意。

以德國的移民開闢國外的世界大洲爲殖民地，這爲我們德國的風化現象也還有一其它可注意之點。復返了回來的，曾到處遊行，踹破了道路的，同着它的命運，它的家鄉破裂打鍋的一個出身較高的社會層的人，最後自救的一着，和惟一可以恢復自己心上傷痕的個辦法，就是他去充當農夫。他的囊中或許還有一點餘款，足殼在德國購置一塊耕田，以便自行耕種的，但是真正充當一個農夫，這是他在德國之所不能的了，因爲那些他自小生長於其中，而要逃避的環境仍然會追逐他，使他得不到安寧的，縱然他已在犁頭後面立着，他在祖國內必將要以他這新職業爲可恥的。然



而在大海洋底彼面，一切皆是生疏的，無人知道他的，所以他便不會以此爲恥了。這樣這殖民地生活——這換句話來說，就是農民底生活了——竟要發展爲一種真正的空氣療病與水療病的方了，竟要以此把病腦病心的人們底病症徹底洗刷了去的。一個人要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尋到他的安寧時，那這他可以在原始的大森林裏尋到的——可是要以一個農漢底身分，不可以一個終日無所事事的懶惰的經濟家底身分的，乃是要按照着農漢名詞底真實意去充當農漢的，他要手足胼胝，面孔上熱汗直流着吃他的酸辛的麵包的。可是在這一件事實裏面爲一位政治家却藏有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就是社會上那些腐化敗壞了的份子最後在農民底生活中和在農民底習俗中纔能恢復了自己的元氣，鮮旺的生機的。

### 農民在貨幣經濟影響之下的劣化

農民道德方面的崩潰是和經濟方面的崩潰攜手並進的。始終均勻可靠的收穫是使農民性

質純良的事物。只是不可豫計的天然變故纔會使他的收穫動搖不穩。可是這宗變故在他們無論如何決不能引起左派所主張的那「對社會報復」的心理。不過田地上的產物越成了投機事業上的對像，越被委棄於巨大的交通危機之中時，那遇着了這樣的事體的農民們便越要由它們那原來的態度裏跳了出來了。霰雹和歉收的天災，他都還能安然忍受，聽天由命地耐守着，但是如果他滿倉滿庫的糧食而不得不受窮受困，僅業務停頓之所致，而這其中的原因他又不能明瞭，並不能相信這原因底必須性時，那他便極易失掉常態，甚至要迷惑起來了。

收穫狀況忽漲忽落，在農民方面永不會有良好效果的。恰切緩進的，按步就班的行動，和始終均齊的工作纔是建樹真正農民性的條件。所以誰要想保持農民底性質純良正直的話，他就應當設法，使它們常處於恒常不變的和鞏固的收穫底限界之內。

農作收成十分之一的田賦地租改納貨幣的制度，對於農作不見得是去桎梏，而對於穀物貿易却的確是去桎梏之舉，較之以前便利得多了，因此小農民便得不到甚麼物質方面的利益，而那大地主因為可以用自己田地上出品作大規模的賣買的原因，便很可能坐享其利了，可是這一宗

情勢漸次也竟成爲迫令小農民去充當小商人的主要成因。到了這時，他對於穀物市場上那抽籤押數字的賭博方法 (Lottospiel) 也要會有點明白，于是便要以他那好起個法律糾紛和好本來的賭博的熱烈同樣地去沈溺於這一宗賭博的方法之中了。因商業上投機的現像，農民底習俗遂被破壞，而農民在其它方面亦並不會有所獲得的，因爲他所具有的才智與資本，程度俱皆不足以達到，可以恒久有效果地參與我們穀物交易所底激烈競爭的。

指證過度小產業所生之惡劣經濟效果，這並不是這兒我這篇論文裏的事體。我的目的，只在敘述由這效果中所生了出來的社會上的破壞。田產瑣碎的分佈，並不是新現像，但其效果中却有許多是新現像的。古代收穫謀生的狀況較爲簡單，所以便自會摧倒了這現像上的危險鋒刃。同一的一德國頃田產 (Morgen)，百年之前，足穀一個農夫過一種鞏固生活，但在現在却僅足一個貧窮的人聊以餬口的了。近來科學發達，土壤出產能力增加，然而在這一點上亦不過略有補償而已，實非真能克除了困難的。農民現在已經使我們覺得都成了窮苦的人們了，因爲它們由它們田地裏僅能取得它們一日三餐的食用，而並無富裕。那一種含有林野詩味的見解，以爲一個這樣的農

人，生活必不能不愉快，那這話，我們是不能向一個詩人責難的，可是實際上，一位國民經濟家，無論如何却總要視農民為窮鬼的。他每日的食糧，一年比一年瘦劣，一直瘦到勢所難免的馬鈴薯為止的經驗，是給這句話佐證的事物。這在從前却並不這樣。這一種今昔相反的情形，其理由即在農民，即便在最小的農民，也都是愈久愈為現金底蓄備之所支配的原因。從前他可以一文錢不費到鄉區共有的森林裏，斫伐建築木材以及作燃燒用的薪木，但是後來這却是他得出高價值買的了。他的廬舍，從前他可以藉四鄰底助力用藁秸覆蓋屋上去，然而現在他便不得不出錢雇修蓋房頂的人們了。從前以天然產品繳納賦稅，這是他較比後來以現金繳納容易弄得多了的。他擺脫掉了現金的羈絆，便是他的財富，這是他的獨立心雄成立的條件。因為這小農民若是之甚地為現金所左右，因為他陷入猶太人們（Juden）高一層的統治之中，所以他的財產狀況雖然今昔相同，但較昔日却寒苦得多了。人們對於步驟過於疾速和徹底剷除近代國家內天然經濟（Naturalwirtschaft）的慶幸未免有點過早了。人們應當作為問題研究一研究，是否農民底特質，也就是國內最富有保守性的份子底特質，因貨幣經濟底惟一統治而被破壞。在這一點上社會政治方面應當強

硬主張一下，貫徹它們對於僅只經濟方面的疑慮。農民並不是沒有理由地對於現金懷有這樣一種奇怪的、本能的敬懼的。它們寧願以雙倍的天然物產吃虧貶值向它們的財東繳納利率地租，也不願以省事的現金去繳納的！

從前一鄉一區全體人民所有的公共產業是較後來的人民多得多了，因此需要便也少得多的，所以一個單獨的人，雖然囊空如洗，然而仍尚能較比今日人們富裕。從前一鄉一區內一切人民對於森林、牧場等類公產的平等權利，是一種歷史的宗法共產制度。這一宗權利從外面看，似乎促進了公共的利益，但在公共利益底包皮之下，却漸次孵育了一大批本來毫無理由可以享受這宗權利的小人物們底存在出來。可是當在增進了的文化狀況，愈向高處緊張的國家經濟，和封建制度在政治方面的倒塌，也勢非使那一宗宗法共產情況倒塌不可時，驟然間便有許許多多小農民，一開頭自己並未十分覺得出來地淪入了無產階級裏頭去。如果有人向農民宣傳共產主義，那農民在這共產主義底名詞之下所能了解的，便不會是別的，不過向這宗宗法狀況裏的歸返而已，可是這在它們的腦子裏自然也要向着十分玫瑰色的理想化的光明去描畫夢想的。然而農民的

無產階級因產業底劈散和所敘述的狀況的原因，一經滋蔓延展，個人因為個人已經一無所有，瞧着自己是可以像主張共產主義的馬克斯一樣講起甚麼「產業即盜竊 (Diebstahl des Besizes)」的哲學來的地步時，那他却也要以十分實際的方式去從事於這主義底實現，而並且還要是和刑事法庭有關較甚於和政治裁判有關的。很稀的次數人們會聽見說，在這樣的些因產業劈散，而被破壞的村子裏農民好以社會理論相自苦，可是很能聽得說的，却是那兒盛行着的些盜伐林木，偷獵野獸，禾田罪犯等等案件。不過道德方面的破壞，便是風俗方面的破壞，風俗破壞，社會構形便也要解體了。

在較大的，接近較大城市的村子裏，情形自然又要不同了。在這兒，道德方面的墮落還會再配上城市惡風底直接影響的。在這兒，農民對於社會已經「談起哲學來了 (philosophieren)」。況且即便不如此，而真正的農民習俗，在那兒也早已就滅跡了的。農民一切性質中，多半只還存留着一種，就是：粗橫與粗野。像這樣的些村子裏的無產份子，無論怎樣却都含有至危險性的，因為在心性的惡化上，這些份子絕不後於城市裏的惡劣份子，但是在粗野一方面，它們還會勝過了它們的。

## 關於市民

### 市民之軋轢天性

市民是「一種有二重品性的人物們」這些樂戰好爭鬥的市民階級與行會，它們全年皆處於互相揪扭毆打之中，這些戰鬥力強的市民們，它們譬如說，像從前可恩城內的人民們（Kölnen）反對它們的大主教孔拉德·封·和赫斯得吞（Konrad von Hochstetten）一般，往往以騎士與傭兵極其忠勇地列陣以對待的，在其它一方面，却也又盡是些城市氣質的庸俗人物，它們愛它們的平穩安靜，人們往往不得不很很地鬥惹它們，纔能會使它們起勁起火，去裂斷忍線耐絲，然而這樣它們便也更耍愈加兇忿地發出它們那打擊的。因此那一句以「安靜」為「第一市民義務」的標語，便完全是由市民底性靈裏說了出來的一句話了，可是同在這一些市民，它們却曾為國家與

社會裏一切大規模運動底靈魂，至偉大的社會與政治的進步底主動力。

小手藝人，尤其居處鄉間的小手藝人們，在思想與言談，工作與習俗裏，也差不多是和農民們一樣地保守堅執着。它們在社會與政治方面也演着一種十分雷同的忍耐默息的角色。只不過這其間還有一種巨大的區別，就是小手藝人多半因了自己這樣卑下猥陋，因了自己不得不無聲無休地斷念浮華，所以纔去忍耐默息的，可是農民沈靜堅貞的保守性，却是一種天真的自然生活之所養成的了。所以說：恒定不易的農民便是健康的，恒定不易的市民便要成爲病態的了。由於這種原因，識深謀遠的政治家便不會向小市民這默忍的，迫而使然的保守性質上置放那一種它不得不向農民天然的，生來的保守性上所置放的重量了。

市民天性上那較爲理想化的部分對於這宗斷念棄絕並毫無所覺。它們真正的生命質素是對於「發明」，「完成」，「改良」的競爭與追求。所謂「競爭，角逐 (Konkurrenz)」這是一個真正的市民名詞；是與那純粹農民底心性相隔甚遠的。舊時代與新時代底市民階級在牠那巨偉的現象之中，可以說是關於一句名言底證明成了事實，就是關於大經濟學家里斯德氏 (Lies) 所說



的：「開創財富的能力却較財富本身重要得無窮之多了。」的一句話。因此長子承繼權和世襲產業底建立並非市民精神裏之所具有，雖然這制度是這樣很地具於貴族與農民階級底精神裏的。最佳的市民遺產是那一種能謀求財產的能力和外面可能底具備，而並不是鞏固的遺產。剛強人物們那至高度的傲岸榮幸，以為一切的皆係自創獨樹，却是一種真正市民的傲岸榮幸，以針對那基於歷史的功名與承繼的產業的閱閱貴族的傲岸與榮光。

較近德國文學界裏的偉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像雷興氏（Lessing）那樣規模愈加宏大地聚健康的，實際的趣才，鋒利敏銳的判斷力，德意志市民好改革改良的火熱興奮於一人之身，而處處與以代表，與以吐露的。並且那恰切便是這位雷興的，會說了那句上帝如果要令他於「真理」和「追求真理的奮勉」二者之間擇一而從的話，這他一定是要向後者伸手去攔取的名言哲理的。這可是一句充滿了榮幸傲岸，和真正市民根性的話語了！況且再一說，即連舊日傳說裏所說的那位妖術師弗斯德博士（Doktor Faust）和大詩人葛德（Goethe）所描寫的那位弗斯德也都還是市民，而不是農民哩。上面所引里斯德氏底那句開創財富的能力却較財富本身重要得無窮之

多的話，從這兒看，也不過是雷與那句普泛的話移用到專門的經濟學領域上面來了而已。可是在這兩句話裏面，便是使市民階級成爲社會運動最高權威的神祕之所伏根之所了。市民階級把這兩句名言底魔力用作能起一切重量的槓杆，這兒在精神底界域裏，那兒在物質謀取的界域裏，這樣市民階級用這些至理名言便奪得了近代社會裏的優勢優權。

市民階級內部所呈現那永久不停息的擁擠擠，來來往往的情況，這其中一個基礎起因，便因市民階級內部含有種類至不同，方面過於繁雜的職業一點上已具備完成了的，而農民和鄉間的貴族主要地則僅係具有惟一的一種職業的。至於職業底對反，那再不會有較比小工業和科學與藝術創作方面至高度精神工作之間的對反更大的了，但二者乃皆爲市民階級之所包括。類似的對反亦然出現於其它市民的組團裏，譬如說：小城市裏的居民，首都裏的居民，直隸德意志大統一國的城市裏的居民 (Reichstädter)，一個世界大都市裏的居民，都是些純然各別的人物們，但是它們在市民底精神裏，仍一律感覺，一律明白大家是一致的。這個情形在農民便沒有了。德國農民多因所具特點底相同，而分散成了組別，然而直到如今，並沒有能力躍進一種普泛德意志農民

總意識的地步。

革良宗教的馬丁·路德氏 (Luther) 在他那矛盾的天性上，真可以說是德意志市民底一個原始典型。他那要把一個陳舊腐化的世界由樞軸裏起了出來，使牠崩潰倒塌的迫切，和同時他那非堅持舊日恒在的狀況，不足以鉗制那羣狂妄的狂熱家的覺悟，二者不問竭地在他的胸懷裏傾壓交戰。因此他的一生裏便現出這樣多的些矛盾來，不過這些矛盾却並非出於麻木無覺，意氣沮喪的心情，乃是直接由良心鬥爭底深處湧溢了出來的。這是德國市民心理上的矛盾性的。

「爲甚麼人們不去作像從前依斯拉艾耳民族 (Israel) 裏所已見諸實行的那宗情形呢？那時全民族裏不過僅只一人國王而已。他的些皇兄皇弟，人們只給他們點甚麼，便要令他們和全民族裏其它人民一律同等了。那麼那一切生長在王公侯伯和高貴家世門第之中的人物們，便不得不永久都是些王公侯伯和高貴的人物們了麼？那終究有甚麼害處呢，如果一位王侯娶一位民間女子爲妻室，而更令他以一位市民底資產相自足自給時，倒轉來，一位貴族底女子去下嫁一位平民的男子，這又有甚麼不可以的呢？貴族只能與貴族結婚，這制度日久天長，終究要令人難堪的。雖

然塵世上我們不能平等，但在上帝之前我們却是一律平等的，我們一般都是人祖亞當（Adam）底子孫，上帝底造物，任何一個人都當得起一個其它的人的。」由路德這些言詞中，不是已經把那一個平等自由的思想都給吐露了出來了麼，用這一個思想，近代市民階級攻破了中古時代那階級制度底壁壘，以便由那荒場廢墟中給政治的自由建樹一種新的社會基礎？人們曾有一次在一個奉耶穌教的德國聯邦裏把路德著作裏這宗社會與政治方面的激烈言詞與段落悉行搜集一齊，而予以警察的封禁。然而同樣地一個民主政府亦是可以把由這位宗教改良家底著作裏所作的名言選集予以封禁的，因為這些言詞過於「反抗民主政治」了。可是這尚非僅只路德一人，乃全德意志市民階級所具矛盾天性之所使然的。

曾有人很有理由地特行指出，路德到處所收震撼一切的那效果皆和一點有至密切的關係，就是因為路德所作宗教講演是對「德國民族」而作了的。但是像我們今日意義之下的一種民族却是那個時候之所不會有的。路德因他在市民階級中間的地位只是在第二點上，纔能說到是成了民俗中的人物的。人們都知道，那個時候的農民對於社會誘惑與煽動家的加爾施達特氏

(Karlstadt) 所感到的興趣，却較比對於出身市民階級的宗教改良家的路德氏所感到的興趣多得多了。加爾施達特氏和路德在社會方面彼此對反的情形，是和所謂第四層階級那求平等自由的兇奮對於市民所操持那和解的，調處的社會傾向的情形完全一樣的。

## 卑劣性市民

在近代的市民階級裏，一種特別的社會病態現象已經達到了爆發的，真正傳染病一般散佈着的地步。這就是市民對於任何社會利害的麻木無覺，對於公共生活的無良心的淡然漠視。近代市民階級上的一大部分簡直明明白白擺脫社會，一個一個牢固地退入他們那私人生活底四堵牆裏面去。國家與社會底遭際患難，只是在有一種個人私利落入它們的眼中時，或只是在藉可供它們談話之資，或藉可爲它們乘機誇耀之助時，纔能會引起它們的同情關切的。人們把市民階級裏這一大族類卑鄙齷齪，絕無高尚心思的人們統括於 Philister (卑劣性市民) 一名詞之下。

卑劣性市民自然也和我們一樣是認市民階級爲中等階級的，可是在它們，並不是因爲覺得市民階級是社會生活上一切半徑線底中心點，乃是因爲它們覺得它們的市民階級是一種處社會不上不下，不好不壞的最善方法的，所以這便是一種毫無所裨益，說冷不冷，說熱不熱的曖曖環境了。

並不是經濟狀況動搖的市民纔最容易變成了卑劣性市民，這一種市民底成立，簡直更是要以一種一定的舒適狀態爲前提的，即便一種極其不堪的，小模小樣的舒適狀態；市民階級到了這個地步，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只生枝葉，不結果實的市民階級了，這階級背叛了市民階級底高尚理想，外面上仍愈加枝葉繁茂着生長了下去：

「熱衷熱情淪喪，

剩下來了冷心冷腸。」

可是在這一點上，農民，貴族與市民之間却同時便現出了一種很可令人注意的區別。那過於以外的階級意識自足自豪的公爵先生是要處處透出公子哥兒的習氣來的，那農民是要僵化在它們那愚昧癡蠢的情狀中的，這換句話來說，就是它們這兩種人民皆係恒久地闖局於極端的階級的自封生活之中。然而那墮落為卑劣性市民的人民們却是把任何階級的公共意識都要喪失了，而那對於社會事務完全不管不顧的淡漠態度便恰切是它們所常持的態度的了。所以從階級性上說，與處處不脫公子哥兒習氣的貴介相適合的，並不是卑劣性的市民，因為它們並非固執它們的市民性的，乃是「庸俗性的市民（Spießbürger）」的，所謂庸俗性市民便是萎縮於階級的偏狹之中的人民。而這却又是舊時代與新時代上頭的一個可注意的區別的了，就是在從前為一種變態不正的市民的，便是這些庸俗性的市民，可是到了現在，排擠了這些庸俗性的市民的，却多半是卑劣性的市民。

卑劣性市民在市民中是人們之所不歡迎的，好以欺騙手段對待的份子，在各黨派中，則更為人們之所戲弄，之所反乘，而他自己竟毫無所覺。他既沒有一種社會的信仰，而亦並沒有一種政治

的信仰，他常常總是和那一些隨機應變，爲眼前時機弄妥一份最便利的信仰的人們一黨一派的。因此他們的言行，悉屬改竄歪曲一切比量各黨派底真正價值的比例尺的一流一列。自從這宗卑劣性市民在社會中簡直成組成羣以來，所謂「公衆輿論」的一名詞，便成了空空洞洞的一個響聲了。因爲凡屬卑劣性市民在一個地方一經發現一點能招致一大批人衆來的動因的影響，那他登時便要毫不計慮地加入，處處藉着大衆底聲勢以發揮他們自己的聲勢，可是因爲他們好這樣追隨大衆，于是便要當先地呼醒一般人們底懷疑，以爲羣衆之聲便是無理性之聲了。這樣這卑劣性市民們即在藝術與文藝文學的事體中也竟會使欲令公衆成爲批評裁判份子的思想變成了一種危險的狂妄景像。譬如藝術場中只要有幾個開玩笑，不負責任的青年們很很地大聲叫上一陣子好，擊上一陣子掌，那登時便會有一大批子卑劣性市民們彷彿百千倍的應聲似地追隨於其後的。

自從歐洲國家與社會底制度形成以來，單個的卑劣性市民確切是不斷地曾有了的，但是卑劣性市民竟成爲一特殊的，賤括的社會組團，這却是一種絕對時下的現象。與希臘古典時期的古



代底精神是相合的，如果人們肯把這一宗卑劣性的人們處以放逐和民法上的死亡刑罰的話。我們現下警察與官僚制度的國家，內部空虛無能上頭的一個可悲愁的特徵，就是我們的國家絕未曾識出卑劣性市民與社會和與國家的危險性，或者即便有所識知，然而亦並毫無處置之方策。卑劣性市民底根本思想是一種很深的政治方面的罪惡弊害，慢性地毒害國家與社會，可是按照警察制度國家的見解，這卑劣性市民同時還可以能是政治方面，這換言之，即警察方面最誠實的市民了。多樣令人可驚愕的一種矛盾呀！在政治上與社會裏甚麼都不作，甚麼都不是，還要說，這不是罪惡，而是近代國家裏的一種美德，這真是聞所未聞，但是人們可千萬不要忽略了：近代國家現像上這一點却真正是一個死點，透着死相的一點。在農民方面，我們即已覺察了出來，我們的政府怎樣差不多只是持着一種否決的，剿絕的態度以涉及社會的生活，而並不是積極地由個人個性中向外發展和向前深造的。在社會上那宗卑劣性市民們，它們對於社會的危險較比信奉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還要加甚的，人們不能以家宅搜索，國外放逐，和逮捕拘禁以對待，人們只能間接地以維護與培養市民底一種有力的，健康的公德心理，為這一宗惡化市民份子開闢滅亡道路而已。可

是在這兒，我們更又會撞到一個其它的矛盾上頭來的，就是：警察與官僚制度的國家一方面極願在社會裏的各種權威裏找到一個靠背，但是牠同時對這宗權威却又懷着鬼胎！因此牠就絕對地只願要懦弱無力的同盟份子了，但是一個懦弱無力的同盟份子，在這兒卻不會是別的，只不過——一個敵人而已。

社會上任何業務經營，卑劣性市民無不可以一一脅着它們那惡化破壞的影響而侵入。我現在只拈出一個例子來以代替實際上千百例子，就是：市民之商人和卑劣性市民之販夫，那絕對還是沒有多些時日以來的一個現像的，在一位受過較高教育的人物，一提到了「商人底精神」，便要想到野蠻人的精神的，因為它們是拿噠啦（Taler，德國銀幣名）和啞囉嘛（Groschen，德國副幣名）以衡量人們底才智的，並且它們全盤的天才俱都形成於一點之內，就是怎樣成百磅地把貨物買了進來，為的是要把牠們再成磅地秤了出去。這對於從前世紀裏商民職業上的市民榮譽多樣大的個對反啊！可是使商人到了這個地步的，仍是卑劣性市民之所致使，因為在這期間卑劣性市民已經鑽進了商人底精神界裏，把它們的毒素傳染上了它們，實際上把它們大多數也已

都毒成了一個這樣的販夫的，所謂販夫，並不需要別的，只不過略稍一點健康的人類理智，加減乘除的四種基礎法，和一點經營的資本，便可以使他成立起來了。誰在商業中每年能使成千成萬的財貨流轉，那人們尋常便要稱呼他是一個商人，可是誰要僅以少少數百之數去辦理的話，那他便是一個販夫了。這是一種無識見的分別。有些作包括一切大商業的，仍不免是些販夫，可是僅只開一個小鋪小店的，仍能不失為一個商人。是販夫，是商人，這所關係的，全在是否卑劣性市民已鑽進了商人底精神裏去，而把他變成了一個卑劣性的商人。販夫是卑劣性的，他買，他賣，全是只顧他自己的利益，不計其它，可是所謂商人的，他求利的心雄雖不下於販夫，但他求利，却只在這利益同時也能為集團，為階級，為國家是一種利益的地方。甚至在營業上，他還能是有一種社會的關切的。自由貿易主義者所抱的從國民經濟方面說很對的原則，以為商人何處發現最價廉的市場，就應當何處大批地收買進貨，並更謂在錢財的事件上情感終止，等類言詞，如果人們這樣完全赤裸地把牠們樹立在那兒，那從道德方面看，這便是販夫們所抱的原則，而不是商人們所抱的原則的。一個真正的商人一定要覺得是違背良心的，如果因貪個人私利起見，而去促進國外底工商業，致令本

國底工商業吃虧受損，這是如同一位正直的政治家要覺得那是有違良心之舉的情形一個樣的，如果是要把本國底利益洩賣給一個異國底政府的話。因此一位真正的商人也要覺得自己是一種國民經濟的與政治的權威裏的一份子的。社會上，那樣的些販夫們有的是，我的意思是說那些每年能使成千成萬的財貨流轉的販夫們，它們覺得那使它們的階級榮耀，商人底高貴上會發生痒痒的快感的，一整年地只是去售賣外國的貨物。

我們的無產份子，盡人皆知，對於商人們是沒有好話說的；如果它們一提到了財產偏於一方而地過度的堆積的話，那它們的意思首先便在商人階級。可是大商人，尤其是銀行家底財富，它們覺得是最不公道的，只是因為它們是把商人看作了社會裏的本來的卑劣性市民，只是看作了上面所說一流經營大商業的販夫的，所以在這一批子人們，它們所費的精力與動作和它們那豐肥的收入相較，既絕非處於一種平衡的比度之中，而那由這一種僅只福惠個人私利的動作之中所挹注於公共利益，社會，國家，民族之裨益亦然是不平衡的。我實在從來不會以無產份子對於「錢袋」那卑劣嫉妬為然過，但是人們千萬亦不可忘掉，挨饑受餓的貧困人們底敏銳眼光在這一點

上是瞧透了社會卑劣性市民底自私自利的了，而那一種可卑棄的階級仇恨至少便是被這一宗僭奪了大商業的販夫們之所大聲疾呼地以招致了來的。

## 政治上的市民

立憲國之政治構形，主要地皆係市民階級之所弄出，而竭力以主持的。無論人們對於立憲主義之起源與方式的見解多樣歧異不同，那這個主義在骨子裏終究要回溯到使社會上的市民在國家底生活裏悉化爲國家公民的地步的一個思想上頭來的。這在農民是很漠然視之的，在無產份子至多不過一種誤解誤用的社會真理而已，在貴族，却要視爲一種異端邪說了。然而一個市民，他一曉得，他是近代社會裏到了政治醒覺地步的優越大衆底一份子時，那他便要在一律水平化的國家公民制度上會最好地測驗他的權威的了。任何一種政治的問題都是一種權威的問題，因爲我們現在並不是生活在千萬年不變易的自然國裏，處處要以自然法（*Naturrecht*）去從事於

政治的。可是立憲政體便是市民階級底權威問題，這是確切無疑的。

立憲主義可以說是關於政治上的中間層，就是關於推動一切的中間力的學說，這個情形是與市民階級爲中間階級的情形相適合的。關於國家各項權界是否應行具有充分威力的問題，彼此互相商討酌量之舉，完全適合市民拘謹慎重的性質，這是由它們這宗心理中之所流露了出來的一種絕不能充分達到目的，而也絕不能充分無有效果的謀取權能的奮鬥，這是憲政各不同方面的權界之所一律同然，一律同曉的；國家底活氣便因這種種方面流動不定的對反而得以保持，可是專一地，排除一切地獨據國家底權威，這是任何人都不能的。這真是市民底精神之所使然的了。但是我們也勿須乎隱瞞，立憲政體之切近於政治上的卑劣性市民階級是和普通市民之切近於社會上的卑劣性市民的情形並沒有甚麼不同的。

解放與救濟的行動背反市民階級底精神，尤其是如果這行動替代例外而成爲常例時。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以前的時代裏爲人們所盛稱盛道的議會自由主義(Kammerliberalismus)仍係伏根於市民底精神界裏的，自然也稍微有些伏根於卑劣性市民底精神裏。人們

並非無理由地稱呼了這種自由主義爲「市民自由主義 (Bourgeoisliberalismus)」因爲這主義促人們向前，而自己却並不離開地點。議論與計劃彷彿是他們較比實施還要重視的。在國會裏面它們急進暴躁的樣子代表憲法政策，輕視社會方面各項權威，甚至黨底利益，在它們，竟要視爲超越國家底利益的。

這一種憲政上面的市民自由主義之在當時，過於忠實地，中肯地成了德國市民內部傾壓不和的現像上的特徵，簡直使我在這兒絕不能拒絕，把這主義當時的政治思想界大胆地約略一揭示。

這種市民自由主義在當時之所主張的，是要王侯——而反對舊日那奉天承運之說。它們要立憲君主國，但同時却是要一民主色彩的——「建立在最廣闊的民主基礎上的」君主國。它們要一位國王，可是主張國王統治而無政權。自由黨派之市民份子表示歡欣，此外依舊還有些諸侯王公等貴族爵位，但是他却是會吃起驚來了，當普路士 (Preussen) 國王在可恩城內 (Köln) 建築大教堂紀念會上大聲說，在德國是還有諸侯王公的。它們要一種議會制度，可是要使那議會能

把各位大臣置入私囊裏去，但也並不因此而自去從政。他們要全體社會底政治代表——但却不要局部社會底政治代表。他們要法國成爲一共和國，爲的是可以令德國的王侯們保持着對於立憲主義的敬畏。他們要德國的根本法則，但却須附帶例外。他們要宗教自由，但却不要耶穌會士（Jesuiten），不要寺院，和自由教會組合底份子。他們要民族運動，民族要求，民族勝利——但却不要革命。他們要市民軍，但却不要普通的民族武裝。他們要求市民的內閣組織。及之這些要求——見諸實施後，反而更爲市民自由主義黨之所棄置不問。卑劣性市民是因了嫉妬心理纔這樣作，纔有了這樣的要求，但是許多良善市民也出來，一樣地作，一樣地要求，這却是既出於正直的，而亦係出於迂拘的懷疑心理的，出於潛伏危機的求良心無愧的感覺的。他們意思以爲官僚與軍人是不能沒有的，但是官僚階級與軍人階級却是不應當有。人們當時的態度，和當時所流行的那句術語所說的一樣，是要完全一般遠地「離開無政府主義和反動主義。」可是人們反因此而竟首先陷入無政府主義，而後來又陷入了反動主義裏面去了。因他們那向兩方面力求公平的迫切，因求政論因果一致的意向，其實實際上已成的事件絕未嘗一律因果一致的，他們一切的努力都成了夢



幻泡影了。人們要是也肯把德國市民階級以前數百年的歷史打開一瞧時，那它便會發現，德國市民階級曾有無數的次數因出於高尚的動因，而竟給自己弄來不少的悲慘命運。德國市民自由主義要求德國底一致，但却是要無害於當前存在的特殊情況的。譬如一千八百零六年改隸直屬帝國之各貴族閱於各邦國統轄之下的政故，人們雖一面贊成，然而却一方面對於此舉之限界却永不能一致。或者又譬如小邦國底個別化和與此相對反的大一統國家底中央集權化，在同一的一個人竟能是同時相仇視的。當時所謂「愛國志士」竟願意德國在匈牙利國（Ungarn）底戰場上打敗仗，爲的是可以使德國的新憲法不致在紙片上受到打擊。

在這宗情形上，人們切不可爲這宗推之向前和抑之使後的永久對反，便彷彿數學上的歸除例題一般，有相等的因數，結果便會兩相抵消的。在片段的方面，這個運動或許不會收有效果，但是這個運動仍依然存在的事實，却是最重要和最不能推倒的個頑強效果。

真正的市民對於他素所持的懷疑，不信任的心理，和他那思想方面力求無愧良心的操持總是忠實的，不肯放棄的。卑劣性市民，它們總是奉大詩人莎士比亞（Shakespeare）戲劇中所描畫

那位卑劣可笑，而好大言不慚的肥頭肥腦的非爾斯泰夫（Falschaff）對於榮譽的基礎見解爲圭臬的，却反而會令人們覺得它們能幹得多了，精明得多了，因爲他們處處追逐權威，一覺自己處境安全，便要下手打擊的了。

因此由上面所述諸種情形觀之，德國的市民階級確係處在一種多半乃經自己之所呼醒的運動之中，但却終究未曾得以重要地趨至前幕。這是他們向來的遭遇，而不會變過樣兒的。市民階級本來是以社會與政治運動上的一種權威出現的，可是貴族那光華燦爛的騎士脚色，無產階級那冒險膽大的脚色，農民那親切適情的脚色却都不曾落到了它們的頭上來。它們不得不徹底奮鬥，然而榮譽與利益一併無所收穫，甚至所收穫的，有時竟是些譏諷與冷嘲，因了它們那不適用的，斤斤於良心的計較，因了它們那拙呆無靈的行動。公共生活奮鬥中自苦自勞的市民簡直是不適宜於藝術寫作之資的，在這一點上無產階級，農民和貴介對於詩人和畫師却是些加十倍豐饒肥沃的人物們的。農民在革命時期裏纔絕不理不顧甚麼原理原則的；凡屬對於他的情形無論有大點或小點的利益，他都要掬取了出來。可是那自由黨派的德國市民却要這樣長久地在那兒鬥爭，

一直等到一切其它的人們在它們背後把所有實際利益都瓜分妥當之後，它們纔肯罷休的。他能惹起國家底大變革，但他却不能由其中澈底吸取利益，完全如同德國平民工業界裏那些能作工業發明的人們一樣，他們不能以之自肥，竟坐令其它的民族反享其利了。

## 關於家族

### 婦女之民族的使命

婦女是保存民族本能生活，情感生活的人物們，而這一宗生活便係表現在民族的習俗裏的，並且恰切因此而更係表現了民族本來的天才的，所謂民族天才，便是民族所具有的那最深摯，最幽邃，最難測，然而却最固有的種種能力，由這種種能力裏在男性的國家生活內便產生了男性方面那醒覺的，意識的全部性靈活動，那全部政治創設。所以說，政治的「民族性」在最末後的程序上終究是在婦女一邊的，而政治的「舉動」便是在男子一邊的了。

我們大家腦中所具有的宗教觀念，是我們在男性方面學來的，但是禱告，却是我們在母親處學來的。母親教訓我們克己自制的德行，父親給我們打開到世界裏去的第一次眼波。因此一偏的

一位母親寵兒必定容易成爲一個塾居室內，而不敢出頭露面，和不能得其發育的弱兒。祖母會最優美地給我們述說童話神話和家庭內的箴言嘉語，可是祖父是要述說給我們他曾親身參與過的時代底歷史的。

男女天性上的區別，人們在這寥寥數行舉世皆曉的情形中不是已經都要清清楚楚地覺了出來了麼？

然而即連這區別上實際的推演，人們亦是可以由此感覺了出來的。

「社會的」美德是經婦女之手首先在我們的心裏頭樹立了基礎的；可是關於「政治的」美德却還需要男性底教訓與榜樣。在男女天性上的區別裏，便已經有社會與國家兩個宏巨的界域底蔭影彷徨由天邊遼遠的個去處隱隱地向我們光照了過來。所謂風化習俗，也就是所謂社會上的推動力，是經婦女之所維護保持的，婦女係立於風化習俗底天然生活中的，只是男子們纔是由公理的覺悟中創設了法律，而所謂法律，便是國家方面推動的力量了。不過國家與社會只是在牠們那兩方面互相澈底的攙涉裏，纔能成其爲一個活潑有生機的完體，猶如必須男女合爲一氣，

纔能成其爲一個完整的人的。

男與女既爲社會與國家的一種比擬，比並，一種像徵，而在社會內部的圈環裏，這同一的一種比擬比並，同一的一種像徵，却也還要重複出現的，不過這比擬比並，這像徵並不僅是一種比擬比並，一種像徵，而也是一種事實的。

在這一點上，在男子與女子底身內保守固執性與前進推動性的諸種權威已經給我們俱都具備完成。可是社會上保守固執性的權威，所謂貴族與農民，便是「最純潔」的社會權威。在社會上推動與前進性的各項權威裏，尤其是在市民階級裏，社會已經被引出了自體之外，而達到國年底範圍之中。市民在中世紀末葉的權威已經豫告封建制，貴族制之社會國家之倒塌。人們曾向我指摘，以爲我特愛敘述社會上保守固執性的各項權威。這是完全對的，但也是自然的。因爲在這些權威裏，社會要素恰切能得最純潔，最充分，最有能力地發展了出來。這樣我也以較大之熱愛與詳盡敘述婦女之情形。婦女是差不多常常都要獲得我的主要斷語的，而男子則僅能斷其爲女子之註釋的陪襯。因爲婦女是造成了家族心思特別優裕的族類，她們完全爲家庭思想之所充塞，然而

男子方面，即便他是立於家庭之中的，但仍究亦要超家庭之外去的。

人們在我們今日的些時日裏，很多的次數曾樹立了一種政治的國民教育之要求。可是足殼奇怪的，人們在這個要求之下所了解的，便是把人民引入政治黨派學說底研究裏去，即已算達到目的了。

關於國民政治教育第一步所當作的事情，我覺得尤其應當是引全國婦女回到她們那最本色的天性上頭去。因為我們的社會狀況以婦女之教育為轉移的程度，却遠超人們素日對此之所想像的程度的。人們應當造就青年女子為風化道德之守護者，人們應當教訓她們安分守己，克勤克儉以處家庭，人們應當把關於她們的教育事業仍再多多歸還給家庭，令家庭特別負責辦理，因為這教育權過多過量地歸到了學校方面去的原故，這樣對於道德習俗的認承，和在自己當前所具有的家庭生活範圍內安分守己，勤儉自持的德性，便也要以兩個偉大的社會上國民德性的資格漸次沈浸沁入男子們底心性裏去的了。

替代如此，我們足殼奇怪地反令青年女子受任何一種藝術的與科學的教育，就是一種絕對

男性教育，可是後來我們竟要驚怪，以爲德國家庭內的習俗消失，我們的兒童們精神上並未曾受到了處社會的內裏把柄，和處家庭真正克勤克儉的美德！男與女底區別並不因我們把女子和男女一樣教育而會抵消，但是社會上的基礎反要動搖了。

我這見解却是離着那令女子們滯處於無教育狀態中的個思想遠得多了，我並不是要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的。我而是要說，女子底教育應當是女子的，就是應當是情緒的，合乎道德風化的，宗教的，熱誠的，換言之，就是一種人生底教育，不是一種學識底教育的。這是男女之間的天然形式所決定的，所以此點之外，還更有些知識底領域，這些領域任何時期總要特別歸男子們之所管領，這如同其它方面情緒生活上也要有些領域，特別爲婦女們底聖堂神殿，男子們不可涉足的情形一個樣兒的。

婦女之獨立運動，恰恰便因教育中對於兩性天然職業之忽視，而竟成爲重要的了。現代婦女多半皆被在各式各樣的男性藝術與科學中教養了起來，竟因此而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染上女性色彩，其實她們是應當在德意志家庭之神祕中教養了起來，而應男子我們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



以真正的婦女基礎聲調的。

## 家與國

家庭是我們不僅在宗教方面，乃亦在社會方面與政治方面所神聖視之的事物。因為社會上一切由機體中所產生那枝節底可能性俱已在胎芽中具備於家庭之內，如同一顆橡樹具備於一粒橡實之內的情形一般。在家庭中建立着習俗道德上頭的社會政治的能量，而法律，便是由這一種能量中之所產出。所謂家庭，這簡直是民族一切公共發展上之必要前提。所以說，毀滅家庭，便就叫作扯除人類一切文化之基礎。

國家是以家庭為前提的，但決非如人們所言，為一擴大之家庭，而家庭之機體亦更非直接為國家機體之原型的。

家族只是「民族人格（Volkspersönlichkeit）」底天然雛形。這兩方面都彷彿我們歷史進

展上頭的天然產品是的，悉屬經道德風化的思想之所確定；然而國家却完全建立在法律思想上。因此設云國家爲一擴大家庭，是不對的話，那在家庭方面或在市民社會方面，如果要追究爲二種機體基礎的法律思想時，便亦然是要不對的了。在這兩方面底性質中，是決不會具有法律的思想的，然而國家方面，自然是可以，並且是不得不把家族與社會拖入牠的法律底範圍裏去的。但是即便在這時我們仍然有好理由不把「家族法」視爲公法中一部分，而是要把牠視爲私法的。

那是宗法國家政治發展上至低階段底一個特徵，使國家在這兒果然彷彿一個擴大家庭似的，（況且所謂宗法國家的，也不過約略能算得一個國家，並非真正是一個國家的。）

國家與家族底區別便在一方面，國家乃係被置放在法律底重心之上，一方面，家族乃是被置放在彼此相親相愛相補充的精神，和以此精神爲基礎，而推動一切的「宗法權」與「尊敬孝順」之威能底重心之上的。

這一宗僵化的，原則上的對反在實際上反而轉趨流動鬆活。國家的法律關係自然會延展到家族裏面去，但所謂國家，當然不僅只是一個赤裸的國家，乃同時也要是一個社會的，在民族人格

裏築根的國家的，所以對於家庭狀況底反擊便絕對不能脫出，而不得不受其影響了。

家庭統治和國家統治是兩件根本不同的事體。但雖如此，然而家庭底衰頹腐敗却亦仍會直接把國家統治隨着自己拖了下去，而同歸於盡。

人們現在較之從前愈加迫切地要求承認諸侯王公，行政，立法，教會，總而言之即一切公衆生活上之權威。這並不會是傍的意思，不過爲求公共利益起見，人們特行要求向這些權威明知或本能地自動奉獻個人意志之屈服而已。在大衆，這種敬畏權威之精神會復返了回來的，「如果當前一代的人民對於家庭之充分權威能得又徹底在心中感受時。」國家各項權界上現在顯然又獲得了的一種威望，何時家庭禮法習俗裏家庭統治之權威未曾得以恢復，何時便是無根柢地漂盪於空中。在文化進展的歐洲不會再有宗法的，純粹建設在權威與敬畏之上的國家統治政體之存在了，但一種宗法的家庭統治却很能會存在的，況且這種宗法的家庭統治還是必須得存在的，如果要叫一種真正的保守精神出現於公民之間的話。惟獨在家庭之間，在我們這一國裏人民纔能獲得權威與敬畏的精神，在家庭之間，人民纔能習學，規律與自由怎樣可以並駕齊驅，個人爲超越

個人之上的道德禮法的總體——即所謂家庭，怎樣而不得不犧牲自己。可是家庭中的這一種教養訓誡底果實，反而是人們在國家生活之中所去收獲的，雖然國家係建立在家族之外的一種思想上。

由家庭之中的權威原則，決不會產生國家底法律原則的，但在家庭之中所育乳的「權威與敬畏的精神」即在今日也還是應當浸透國家統治與國家公民階級，使之神聖化，光明化的。

家庭禮法道德對於國家法律的關係恰切也是這樣。太古時代，家庭禮法道德和國家法律都完全是合一的。到後來法律覺悟進展的時代，出於人民本能的習俗，道德禮法，便凝結成了一種習慣法，因之竟演為各民族所具最古與最普通法律之基礎。從這時起，在理論方面習俗，道德，禮法與法律為後來的一切時期俱已分離，而各成為一體。可是在實際方面，民族習俗道德之精神應當永久貫徹知覺的法律生活，而時時向之發展一種改新返少的影響。只是一個死的法律國，機械式僵化的行政國纔肯立意把這宗道德禮法與法律之間的內裏的思想的關係剷除了的。

屬於哲學和國家與民族科學研究上最有趣味的問題的，便是把各民族間所具之公衆習慣

和所傳流的家庭習俗禮法上之殘餘互相作比較，以便人們可以因之而覺悟，家庭習俗禮法與國家立法之間存有何等樣的神祕交互關係。這樣，人們便可豫感豫覺地向各民族精神生活不可測識之幽深處瞧了進去了。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能力操持與忍受家庭統治，那它們對於任何一種國家統治也不會覺得合適的。雖然如此，然而家庭統治與國家統治却終究演成根本不同的事體了。可是家庭習俗禮法愈鞏固，法律底力量越會鞏固的。十八世紀也在我們德國發展出來了無家庭底精神，警察制度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無階級化繼之而發現於十九世紀，可是到了現在，就只有兩條路子了，就是或者返回以前的狀態，或者崩潰滅亡。

家庭道德，風俗，禮法恰切是「人人」皆能致其偉大貢獻之所，以便（用句時髦的話說）可以「改良社會」，呼醒強健的市民意向，在人民方面建設真正保守與忠誠的精神，鞏固國家底統治。從新建設已經破壞了一半的社會的至高任務為每一個人都在家庭習俗道德之刷新裏具備着。甚至給婦女們也是在這兒指定了她們政治活動的範圍的。替代對於新憲法去妄議空想，我們要把我們的家庭再置入規律與秩序之中，然後我們也便都是政治人物了。「誰要是想有招魔降

怪的本領，誰就應當自身貞潔。」在我們自己的家庭裏面，我們應當先把我們自己修治貞潔，以爲處個人，處社會，處國家之根本。

## 民族底風俗禮法

由一家內各份子之間所具天然權威與敬畏之基礎情形中，家庭底習俗禮法便產生了出來，這宗習俗禮法便是鑄造家庭成一定的一個形式和給與家庭一定的一個秩序的事物，如同法律爲國家生活內法律意識底鑄形的情形一般。

習俗禮法底裁制以家庭爲出發點，以便向社會，並且藉法律和法律習慣底機體發達也向國家方面展佈牠們的勢力。

習俗禮法底發生，我常以「民歌（Volslied）」之發生與之相比較。一種習俗禮法之發生，決不是一個個人可以任意而「爲之」的，牠的「發生」，牠的「成立」，都完全和民歌一樣。經一

個個人所創立的「設施」，必須經過一輩一輩一代一代的人們底確認，擴充，和增補，然後纔能成爲習俗禮法的。這個情形在字源方面，已經在與「習俗禮法(Sitte)」往往視爲同一意義的「習慣，風尚(Brauch)」和「因襲，傳統(Herkommen)」等字樣中暗示了出來。由這兒看起來，風俗禮法簡直是整個一條人類進化鎖鏈上的天然的，機體的產物，而那一種偏見，以爲風俗禮法是純良的，因爲牠們經年歷月，年代久遠，尋常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了。一首民歌必須也得是古老的，很古老的，纔能成爲一首極其純真的和優良的民歌。「一首完全新的民歌」這本來是一種無意識的說法的。因爲一首這樣的歌曲固然可以在民間歌唱，但却不能是「人民之所造出」的；要使牠成爲人民之所造出，還需要久長時間的。

到這兒我們便應該更前進一步，加以追問，究竟甚麼是風俗禮法上實質的價值呢？這風俗禮法因爲年代古老而纔純正？

在這一點上，我簡直要樹立兩句似矛盾而實相同的斷語了，就是第一句：無論怎樣說，大多數的風俗禮法總是好的，因爲古老的原因，第二句：實實在在尋常最古老的風俗禮法便是最良好的。

我們在上邊已經識知，所謂風俗禮法，便是一整條人類進化鎖鏈上的歷史產物。牠們不僅只是蓄藏個人一時一刻的趣思趣才的器具，牠們也是蓄藏我們民族千百年以來的哲識的器具的。我們的民族一世一代過去了，但是我們的風俗禮法却依然存在，而同着我們民族一世一代底更迭而逐漸增殖，逐漸醇化，可是同着這些同一世代底更迭，我們民族精神方面歷千百年而不變易的基礎觀念上的全部大遺產，便都和我們一一地密切結合了起來。所以在這兒便也又是那一種頗覺與父祖的權威尊嚴相類似的情形重復出現了。因為民族底風俗禮法是這樣經「全民族人格」之所創立了出來的，所以我們置於這宗風俗禮法之上的價值，便要高於經個人所弄出的那種習慣，那種慣例的了。由這兒可以看得出來，人們是不歡迎一個個人去制造法律的了。可是人們既在這兒要相信，那是愈加尊嚴，愈加妥善的，如果一種這樣的工作是在全民族人格底名義與委任之下所創出的話，那麼人們自必不能不加高多少倍地去估計那民間大眾公意公會底重量的了，這公意公會自千百年以來即在那兒自開自議，爲的是要恒常地和緩緩地造出民族之風俗禮法來！



在這宗風俗禮法之中茁根萌芽的，便是那最普通和最能持久的法律，國家那本來的根本法則。這些風俗禮法是建造一條由社會達到國家方面去的橋梁的事物。如同藝術性音樂如果能隨時復行向民歌之湧泉裏歸返，便能得以刷新改造和獲得新生力的情形一般，這樣連國家底機體也會返老還少的，只要牠肯用任何一個方式去從新顧及民間的風俗禮法時。開闢與規定關於民族人格的注意與顧及的舉動，這便恰切是「社會政策 (Sozialpolitik)」底任務。這樣，民族雖經千百年而仍能不老衰，縱然民族中單個份子，在數十年之中即已老朽，由此可知，民俗與民歌為那班勢將老朽不堪的政治家與音樂家的確是真正返老還少的一個神泉了。因為民族內部所具頗不易耗喪的青春少壯精力，便是在牠這民俗和民歌之中紅熱發光，並且習俗禮法和歌曲越古老，那牠們青春少壯的力量自然也要會愈益加高的，因為這樣牠們的根芽便算是被種在了民族最早青春年齡裏去的緣故了。

然而如果要說是習俗禮法會經過萌芽，生長，繁榮三個階段，那牠自然也不得不經過萎凋一個階段的。上古的風俗禮法俱會僵化，枯萎，和被人們所遺忘。不過那些最原始的，却差不多總是能最

持久的更因牠們很古老，所以便又是良善的了，而關於這一點的原因，就在牠們歷經千百年底火煉，質素早已醇良的緣故了。

一個幼稚天真的時代還能特別具有適當的無偏無頗的心情和天然天性的知覺，以便有能力，可以去闢創那些最普通和最合乎道德，因而爲家庭與社會生活底實際奠定千百年基礎的風俗禮法。對於一種風俗禮法，是人們須要具有信仰不疑的態度的。假設我們現在即便能想出十分優良和新鮮的家庭與家族底基本條件的話，那由這些條件中也很難會有一天發展成風俗禮法的，因爲造成我們環境的一切方面都要來對我們的新規則加以批評指摘，而僅只能有最少數的人們纔要持着一腔信仰不疑的心思出來接受和保持的了。一個像我們今日所處的時代，在法律底領域上理論方面能這樣地具有創制性，可是一到了實際方面風俗禮法底領域上，却就絕不能是那樣具有創制性的了。我們對於我們所承襲的風俗禮法須要加以醇化，加以補充，或者加以破壞，即便在重要性減殺的事體之中，我們也仍究要栽植新風俗禮法底根芽的；但是像對於民族全部性格有確定力量的「民族之基礎的風俗禮法」却是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不能創樹的了。爲此

即便我們民族舊日的基礎風俗禮法並不見得有實際人們所說的那麼純良，那我們也仍不得不堅持這些風俗禮法的，因為在這些風俗禮法之中具有一種尊嚴權威，如果這尊嚴權威一經破折，「爲我們便永不會再能獲得的了。」民族與國家必將隨之倒塌崩潰的，如果它們的基礎習俗禮法一旦倒塌崩潰時；因爲這宗風俗禮法一被放棄，同時便是全國家全民族之整個性格，它們內裏最深處所具文化能力隨之一併見諸打消與摒絕。

### 家族情意與繼承產業的風尚

爲的是令人們可以直接由觀感中明白，異鄉異邦的習俗潛入家庭中同時能多樣深遠地變革一個民族全盤政治與經濟的生活，我特由實際的事實裏拈出一件有關各地民族心理不同的平行事例來，述之於下。

在歸巴燕國管轄的萊茵河畔伐爾次地方 (bayerische Rheinpfalz)，十八世紀平等自由的

思想因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倫 (Napoleon) 的統治竟致也侵入了當地人民底宗教，社會和家庭的生活裏。于是直接結合於這一事實之上的，便是伐爾次地方人民全盤意向底一種有着至高度奇異性的轉變。可是當時法國派對於所謂社會自由與獨立的見解和德國派的見解主要不同之點便在法國派是要使「個人」以個人資格而獨立，而不受任何桎梏束縛的，然而德國派的見解則以為個人是社會上的組團和家族中的一份子，所以在「社會組團」和「家庭」底權威與獨立裏面自然也要包括了它個人的獨立的。這兩種見解底對反由下列的情形中愈可見其顯明。在伐爾次地方法國派個人不受任何桎梏束縛的理想竟這樣根深柢固地窩巢於人民之間，簡直不僅使家族狀況因之而完全變了個樣兒，就連社會與經濟的狀況也是向着一種充分的變革裏奔趨的。個人所感到的完全自由獨立的迫切，其結果竟使這塊地方上所有田產俱皆零碎分割，散佈在各個人底手中，簡直成了一切經濟生存上繼續無間的瓜分，一切財產和所有權底動搖流動，種種情形，在德國並不會再有二份的。這一切的狀況都和鬆弛活動了的家族精神有至密切的關係。個人不肯把它個人無拘無束的狀態為宗族底光榮與權威而犧牲；在這兒一位作父親的不會

安心瞑目的，如果他爲恒久保持家族之威望與產業而去縮短後生諸子底遺產部分，並且如果更向他們再特別囑咐一番，叫他們爲他們的長兄遺產之主，去服務和爲他的助手，以便促進與增加門楣之光，合家公共威望的話。末後所說這一節却是真正德國的情形；如果人們能把牠作一番正當理解時，也更是一種很深邃的道德見解的，可是這種見解令那在法國派個人無拘無束的思想中生長了起來的伐爾次人們反而覺得是一種純粹的不道德了。所以在這個地方老人一去世，遺產是要在兒女之間均分的，因而兒女大半俱皆被迫而不得不出去「爲它人服務」甚至在街市上充當散工，以資餬口。用着一種令人至堪驚奇的英勇勤奮與忍耐——因爲這特別是前部伐爾次人們底特徵的——這些人們在所分得極小一塊產業上少吃沒喝地窮混，可是——這他們說是自由，他們處處落到重利盤剝的猶太人們底手中，爲他們所宰割，可是——這他們說是自由，他們不得不出去給人家服務，給人家當伙計，竟至當散工，可是——這他們說是自由。多樣奇怪的個矛盾呀！在他長兄底家庭內充當助手和特別優遇的工友並且視家庭爲一種道德的人格，恒久地保持自己家庭底產業，這他要稱爲不可耐的奴隸制度，反之，在外人底家庭裏服務，當散工，這他稱

爲自由！這樣又譬如說在伐爾次地方，當伙計與當學徒的，都少有肯服從師傅家中的家規的；他根據工業自由底權利任何一日皆可自爲師傅，或充當工資工人，這是他「個人底自主權」，無人能得干涉，可是充當工資工人，他自己便覺得光彩得了，較比把自己算爲師傅家裏的一份子，算爲師傅家裏舊日那傲岸意義的「家人」。

現在我們可以把與此相反的情形繼之敘述於下了，這個情形是出於德國人們底天性的，按照德國人們底天性，它們是不要爲自己一人要求無拘無束的自由權的，它們是要在家庭底榮耀和權威中尋求個人底自由的。在西北部德國直到如今仍還有些農村，在這些農村裏農院，即當地所稱之爲「場院」(Stalle)的，仍被視爲家族底根本產業與世襲產業，是它們對之有非常大的敬意重視的，恰如愛國志士神聖視祖國的情形一般。在這兒作弟弟的諸子們，如果他們不到家外去尋求他們的幸福時，就情願處於兄長，就是襲產掌家的人，底手掌之下，以特別優遇之覓漢之身分爲他作工，和伐爾次人們一樣同出於一種迫切的心理——就是出於求自由的迫切，不過在伐爾次人們却憎惡這一宗情形，在這兒的人們却要歡迎的了。在這些人們反而要視爲不堪的奴隸

情況的，到外人底家裏去作散工底活計，而不肯很光榮地在父兄的家裏作家臣。假使後生諸子故去，而他們是人們所稱之爲「老青年」的人們，終身未曾結婚，並且是在他們兄長家裏作工的，那他們尋常也要把他們一點小的遺產部分和他們所節省的錢財都又遺贈給他們的長兄，產業之主的，雖然他們的長兄即便不如此而也已差不多據有一切，雖然他們的弟妹妹們對於這樣一筆挹注能有愈加妥善得多了的一種用項，雖然在個人對於處位特別優渥的人們所起的嫉妬心理底天然流露會阻撓來作這件事體的。可是那本來也並不是爲了長兄底關係的，在這樣的方式之中甚至連他弟妹等輩所節約的款項也都又流入他的掌握中；這是爲了家庭，爲了家族，纔肯把自己身後財物遺贈給他的，而那所謂長兄，也不過僅只彷彿全家族底擬人化而已，總代表而已。所以在這兒便完全和伐爾次人們相反，是個人把它個人全部利益爲家族底發達而犧牲，而一位作父親的在這兒也恰恰要和伐爾次的情形相反一定難以安心瞑目的，如果他爲求各個孩兒們暫時的私利私益起見，竟要將他的身後遺產在它們之間劈分，破壞「場院」，折散家庭，使祖先的庭院成爲一個空空的抽像名詞。同是這一個情形在一位生長於德意志派的家庭情意之中的下部

撒克遜地方 (Niedersachsen) 的農場農民恰恰又要視爲純粹的不道德，而在伐爾次人們便要視爲人道，視爲神聖的和人類的法律了。

在這兒人們能得以識知，我們社會的和經濟的狀況多深邃地茁根於我們的家族之中，同一謀求獨立與財產的欲望，使我們達到一種直接針對的情狀上頭來，「因爲關於個人對家庭的關係的見解有所不同，」而兩派又各相信，惟獨自己的一派纔合乎自由獨立的精神，其它的一派便是奴隸的制度了。可是在我，我覺得我們德國派的見解在道德方面較比時髦的法國派見解自然要愈加深厚的，因爲按照我們德國派的見解，個人是要把個人自私自利的心和個人無拘無束的自由爲家族而犧牲了的。而所謂「家」的，人們在這兒並不理解爲目前的一輩一代，乃是視「家」爲我們「一族」，「一戶」貫穿過去與將來的一條偉大歷史鎖鏈的，對於這樣理解的「家」「戶」個人一己的小權小利自要消滅於牠的顯赫與權威之前的。那麼個人不是也應當把個人的利益貢獻給國家，給民族的麼？那麼好吧！家族也是一件和民族一般巨大的，一般神聖的和對人類底進化有決定力量的事實。如果要說具有犧牲精神的愛國主義是道德方面一種偉大



的美德美行時，那像我們在北德意志農民處所發現那結體於風習禮法之中而具有犧牲的精神的家族情意自然也要是一種偉大的美德美行了。

## 關於勞働

### 論勞働之榮譽

榮譽是我們自由自主的人類位分之特徵。如果我們能明白和覺悟我們是一種道德的人格，那我們便是有了榮譽；如果我們能把在我們心曲幽深處所識出的我們人格底原型拿來處處作爲我們行動上的裁判，那我們便是表現我們爲榮譽的，爲正直的。

但是我們仍不能自認滿足的，如果我們令我們時常處於個人榮譽地位，而行動正直榮譽，我們也是要令它人在這兩方面來承認佩服我們的，這便是榮譽二字外面的解釋了。這一種對於我們外面榮譽的承認並不是別的，不過是對於我們人格上所應行獲有的權利的承認而已，而人類一切公共生活便都是置放在這一宗權利之上的了。可是我們要求這宗第三者底承認並不僅只

是直接爲我們整個的個人，乃亦是要爲我們單獨的行爲和特別爲那一宗能把市民社會裏一定的個地位指給我們的工作勞働。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現在講談一種「職業與勞働之榮譽。」所謂職業與勞働之榮譽，就是我們要瞧見人們在我們的工作裏敬重我們最獨具的，個人的特色，這一種求工作方面個人榮譽的欲望，文化程度愈高，在一切民族圈環裏所醒覺的程度也要愈加巨偉，而由這一種欲望中人們更可推知，最適合個人特色的工作便要是最適合人類位分的工作的了。一個尋常的人底工作榮譽，一經被人們所誤認，所輕蔑，便會呼起社會主義色彩的悲憤憤懣，而暗中煽惑搗亂的；可是這工作榮譽的一個理想對於社會主義却又具有粉碎牠的力量；因爲所謂勞働榮譽以適合個人特色的工作爲前提，而這爲那主張集團工作的社會黨徒們却就完全不適用了。

最古的先知先覺們都在宣講着工作之宗教式的神聖，而工作可只是以人類爲前提的；可是勞働底榮譽到了現在已經發展成了一個近代的名詞了，這個名詞只是在文化發展得很高社會中纔能充分發生牠的效力。

然而我們並不止於希望人們這樣對於我們榮譽的外面承認，我們甚至以為榮譽底充分存是在以它人底承認為條件的。縱然一個人身內具有加倍多的內榮譽，並且對於榮譽心有確切的把握，但是這在它仍是不足的。如果它瞧得，它的榮譽未為人之所知，或甚至為人們之所不承認，那它便要以為它的榮譽是受了致命傷了。德國一句成語說：「榮譽是要為人們之所敬重的。」因此所謂「榮譽，名譽」的，便不僅是我們對於道德人格的自意識，也並不僅是這個意識在榮譽的，正直的事實中的表現，乃亦是市民平民的社會對於這一切方面的承認的。一個有道德方面自意識的人是有理由要求第三者對於它的榮譽的；這樣，一個民族如果已經覺悟了它們工作方面道德力量，那它們必定也要求，視這工作底榮譽為「一種權利。」

榮譽底現象令我們覺得有三重的方式，即：第一，我們應當榮譽地，正直地「行動」；第二，我們應當「明瞭」；在這宗行動底方式中我們道德尊嚴底充分含量；第三，我們應當要求它人對於我們榮譽底「承認」。

在不同的時代中，榮譽這三方面要素底出現也是不同的，有時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之出現

愈加堅強，往往甚至是偏頗地確定的。這樣譬如人們說，在中古時代，關於榮譽的思想曾有一度特別的發達，雖然這個時代在道德方面的地位決不會高出於現代的。不過中古時代各種統治制裁的階級却這樣嚴重地向第三者要求對於他們榮譽底「承認」，他們更進而把這宗承認上外面的徵號這樣仔細尖刻地加以一番規定，他們這樣生硬跋扈地以他們的榮譽自恃自豪，並且這樣精美地講說與詠歌他們這榮譽，簡直實在是永不會見過這樣嚴重要求榮譽，和為榮譽而抗辯的情形。然而當時人們之所擁護奮鬥的，大半還都是些外面的，限於各階級情形的榮譽，自是之後，關於道德的和榮譽的行為的理想，却就加多倍地發展於各人民之間了。到了現在，我們關於榮譽的「要求」已見減少，這是因為我們所已「具有」的榮譽底數量愈見加多的原因了。

如果要說男子們過於頑強固執地要求它人承認他們的勞働榮譽，要求人們向他們加以敬重，是幼稚文化階段上的一個弱點的話，那在萎靡衰疲的時代，却往往要呈現反面的情形了，就是人們反而覺得自己崇高地超越於勞働榮譽之上，而要輕視牠起來了。這樣譬如說在前世紀便完全算特別貴族式的了，假如一個人終日絕無所事事，絕不作工，而專恃它的錢財以為生活時。當時

它們一般人們的心理，都是以爲平民之中的下賤人民纔作工的，貴人却不能作工。我不知道，在當時是否要視爲侮辱的，假如人們以「遊惰份子」去叱責一位子爵先生，並且不知道，他是否要爲這句話拔佩劍和他併鬥。在我們現今的時日，大城市裏的投機家總想儘量疾速發一大批子財，摟捲這樣多的錢，竟致使他在充分壯盛的男子年齡裏已經可以勿須再作工，而專恃利息以度日了。至於說真正有學識，有道德的人們有一種工作底需要，並且至於說他肉體與精神底力量能支持多久，他便要工作多久，而這是他所認爲榮譽與歡樂的話，那這在那些貪財享樂主義的人們却要對之毫無所知覺的了。終日遊閒無爲，以自己的錢財爲度日之資，這在他們覺得是一句有魔力的話，而這句話便是由社會上那最精美，最粉香的地位裏之所吐露了出來的，並且那宗每月能由股票上剪下無數的付息單，到銀行中取息銀的豪情，更是他們覺得超越一切之勞働榮譽的了。如同百年之前世襲貴族視勞働之榮譽如無物，因之視工作爲榮譽之良好風尚遂被敗壞，而此更係因當時貴族階級完全特別惡化之故之所使然的情形一般，在我們今日大城市裏的財閥之間也是有着類似情形之出現的，恰切也是因他們含有至夥多的社會病態於自體之內的緣故之所使然。

的。

舊日行會在關於外面承認勞働榮譽的方式中從前往往走得太遠，甚至到了可笑的玩戲地步。可是到了現在，竟有許多工匠，手藝人們却把這個情形倒轉了過來：他們是最愛暗中，令人不能得知地經營他們的業務的，如果人們在其它的地方遇見了他們，那麼人們往往費盡心機，也不會探出，他們究屬那一行會。假使這個人有一子，那這作兒子的，就決不能置足於父親底職業中；因為那便是人們所認為上流的，去批評自己的職業為一種惡劣不堪的職業，而決不肯令兒孫們去學習，是要儘量送它們到高出許多層的階級上頭去的。總而言之，人們是不願意叫人們瞧着，彷彿自己「不得不」作工，彷彿不作工，無以為生似的人們是願意叫人們瞧着，自己作工，是出於愛好，出於消遣，人們繼續一種業務，是因為人們既已有其業，而不能擺脫的緣故，可是過早休職休業的人們尋常是要沈湎於醇酒和其它罪惡之中去的。此外更從時下卑劣性之市民方面說，他們也總在覺得一個人根本不作工，而能以自己的款項維持自己的生活，便真是地球上的天國生活了。

所以在這兒便絕提不到對於工作榮譽之承認之要求了；反之，人們簡直要以工作為恥起來

了。

總上所述種種情形觀之，以前對於工作榮譽不免有些過火的地方，因而現在縱然也免不掉這兒那兒有些反響出現，免不掉這兒那兒有一個兩個無知愚徒以工作爲可恥——因爲凡是重視不工作的快樂過於由工作中所流露出來的快樂的人們，總要是些無知愚徒的——然而我們就大致上看，便不能不承認，在公衆底意識中，關於工作之榮譽之觀念，却是無邊地愈加深邃，愈加純正了。

## 工廠工作

工廠工人彷彿完全立在了民族勞作範圍之外似的。它們所製出的製造品，決不是能反映它們個人底精神的。工廠之所製造的，純粹是些成大批形式完全相同的製造品，而那一提到「民族勞作」的字樣，首先僅只想到工廠工作的人們，自然心裏也會這樣容易起那宗以爲近代的勞働



愈久愈使自己和其民族一律同樣化的妄見的。從其它一方面說，工廠工人亦然已非生活在民族底天真習俗裏面的了。它們所處的地位既不是肉，亦不是魚，非此而亦非彼。就是那一種它們所缺少的「真正分工之制」的狀況已經把它們扯出同農民那富有詩韻詩味的民族生活的連繫之外去了。因為工廠雖然是極端尖化「人工」分工之制的，然而却因此而並不稀少地毀滅了「天然的」經上帝之所制定的分工之制的。

· 天然的分工便是：男子操作於外，女子治家於內，而兒童則從事於遊戲與學習。但是猶如那宗常見的情形一般，男女和兒童一律工作於工廠之中，那這宗天然分工便見諸毀滅了，於是男便不能成其為全男，女便不能成其為全女，兒童便不能成其為全兒童，乃是三方面都一律只成了差不多一樣的賺錢的工作力了。至於說工廠內一人製針頂，一人製針挺，又一第三人製針尖，那這便是所謂人工分工之制了，由這宗分工之製中自然會給我們較比以前任何時期都還要加倍豐富地生財生產業；但是由那宗天然的分工之製中，自極其古老的時代以來，就給我們產生着我們純粹人類文化上頭最獨具獨有的特色。

至於說由那樣的些工廠工人們，它們只有一睡處，而無住室，只有一飯碟在賣熟食的廚房裏，而無炊竈，只有一位不成其爲婦女的妻，和一個不成其爲兒童的孩子，而無家庭，——人們自然是不能希冀期待它們，像內地城市裏一位小手藝人一般在市民之間保守農民底習俗，而這樣竟在它們那由勞働底方式而生出的習俗中去向民族人格之鑄形上添加奉納它們那因它們機械式切合種屬的製造品所絕不能添加奉納的份子，這是不用說的了。

雖然人們肯這樣甘心承認近代工廠制度之必要，雖然人們肯這樣高估計工廠制度之價值，但是人們却決不可因此而對道德方面與社會方面那巨大危機閉目無睹，這危機時下總還是由工廠工人非此非彼的地位中在源源不斷地產生着。屬於這宗危機的，此外也還另有一種情形，就是一個這樣的工人既非按照市民，而亦非按照農民底方式在民族的勞働上有他直接個人的份子的。只是在他——如同一切其它勤奮的人民一般——因他手頭的製作增加了國民底收入時，他纔間接對於全部民族人格底發展有所裨益。工人不設用的工資可以增加，工人疾病與年齡上的困難可以防止，但是大多數工人在工廠中的日常工作却總仍爲儘思力所及，地非個人的工作

的。而在這一點中，便隱伏着一個湧溢的水泉，時時刻刻地在向外湧溢着，不滿與社會的不和。

那是關於民族勞動上至低層的個着目點和極端外面的個概念的，如果人們把牠理解爲經營製作的人力底總體，所謂羣策羣力，以建設民族與國家底物質財富。

此外，如果要說因工廠工人數量之巨，個人製作和個別民族習俗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喪失了一塊地盤的話，那我們也不可遺忘，其它方面精神勞工之數量也是非常之大地激增了起來，我們不可遺忘，它們已經創立了一大批新職業，並且因此而將它們的權威增加了十倍上去了，我們不可遺忘，精神勞工簡直已成了近代社會界域裏的領袖了。它們恰切是代表最有個人色彩的工作的，並且負有時時在高抬着工作之精神的與道德的方面的特殊使命。

純粹精神勞工界之大師之製作，在我們今日，他們具皆了然，它們是立於民族，立於國家之中的。可是無論任何一位勞工都應當學習着在這宗知覺中製作；因爲任何一位勞工至少也是一位精神勞工上的一部分。並不是利己心，像許多國民經濟學家之所主張的一般，是立於最中樞的重心之內，以運轉推動經濟界，而爲牠的律則的基礎的。由純粹利己心思底那宗道德方面的惡劣不

堪永不會產生一點甚麼偉大的事體出來，可是我們天賜豐厚的國民經濟却是一點偉大的事體。即連那地位最低的工人至少也可以感覺到，他的勞働是一種道德作爲，而那在工作中支持着他，使他對於工作不起厭惡，在工作後，對於工作感到欣慰的事物，除去一種有良好效力的強制性之外，這種強制性，即連那創製的天才家也是不能缺少了的，便是對於這宗道德作爲的明瞭了。所謂工作乃道德作爲，就是因爲他「不僅只是爲自己」，乃亦是要爲它人，首先他便是爲他的家族而工作的。這個圈環隨着個人所受教育底增進，以逐漸擴大，而那爲國家竟在工作中把自己忘掉了的人們，却並不是些癡子，傻子，理想家，乃是我們民族中最優秀的份子的。這樣在文化底真正進步上，像這一宗的覺悟明瞭，最後便應當鼓舞到任何一位工人上頭來，使它明瞭，使它覺悟，它不僅在爲它自己，爲它的家屬而工作，而勞働，乃同時亦是在爲國家爲民族而工作勞働的，它更應當明瞭，它是羣策羣力中的一份子，以便建造我們生機最深厚的生命底基礎，就是建造我們的民族人格成爲一種特殊的方式。只是在這一個思想果能不僅燃燒着穿過創造發明的才士們底性靈，而亦要進而穿過工匠工人們底性靈，使之得以徹底了悟，而時時在督促着它們向前時，那人們纔能說，

國民對於自己的認識亦然已充分地 and 具體地表現在覺悟的，個人的民族勞働之中。

### 效果，利益，盈餘。

一付販夫的頭腦，都是要把關於物質利益底概念和工作上理想效果底概念互相混淆誤用的，而對於這兩方面底價值，應以效果爲估計之標準時，却反以利益爲標準了。

假使我們的勞働是在支持與促進着我們的物質存量，和同時我們民族底物質財產時，那這工作在私人經濟和國民經濟方面便是所謂生利益的了；可是這工作如果在精神與道德方面是引我們到高尙處去的，而同時對於民族精神與道德進步有所裨益，那這工作便是所謂有效果，有成效的了。

物質財產底範圍，是屬於「國民經濟學」底研究範圍的；因此牠首先之所研究的，便爲工作之利益；反之，屬於「社會學說」研究範圍之內的，却爲「民族底公共生活，不過社會學說之研究

民族公共生活，是要理解之爲「一種在工作中已演成了風尚文化的公共民族生活」的，因此社會學說對於工作之研究，便不僅只依據利益上的天然律則，乃是亦要依據效果上的天然律則的。爲一種效果，一種成功，我們可以樹立紀念碑，效果會給人們弄來流芳不朽的聲望，民族工作底效果，和力能推動民族的個人底效果，都會有一種關於個人的歷史記載——就是人們所稱之爲文化史的；可是一種關於利益的歷史，却是沒有的。因爲誰譬如說把一部關於物質的國民財富的歷史，要寫成一部關於利益的歷史的話，那他決定不過僅只會弄成一部死氣沈沈，毫無科學意味的惡劣作品出來的，如果他不要把全盤的材料在道德主旨底立場和在民族思想進化底立場之下，加以敘述時——這換句話來說，就是應該把牠寫成了一部關於成效，成功，效果的歷史的了。資稟深厚，教育徹底，和精神自由的偉大人物們，自來都是于效果之外，輕視利益的，他們卑棄利益，情甘挨饑受餓，只爲的是要收效果，效果，在他們是覺得比報酬他們的工作還要加甚的。可是他們所夢想的那宗效果，他們往往不能親身經歷，只是在後來的些輩代裏，這宗效果方能得以出現。既這樣，那便僅只是對於將來的效果，將來的成功的豫感豫覺，纔是激勵安慰他們的事物的了。爲後

世工作，是效果底極峯，成功底絕頂，所以眼前的缺乏與失敗，又能算得了甚麼呢，要是是我們果能懷着一腔誠仰的希望，神思之中瞧見象徵最後勝利，象徵「百世流芳」，「萬世不朽」的長春樹之枝葉在向我們遙遙招展時。

純粹的手藝人用手頭自然是不能像創造天才家那麼容易獲得效果的。他對於他的工作底效果幾乎毫無所知覺，而他工作的目的自然首先僅在博取利益。雖然如此，然而人們對於最低工人亦不可估價過低的。任何一位工人對於工作底功效，對於效果仍還有一點隱暗的，彷彿在為紗巾所蒙的豫感豫覺。譬如最小的農民皆知曉，他的工作不僅只為養育他自己，乃是同着他全盤的階級在為世人制造食糧。這一個思想竟這樣到處徧傳徧佈，簡直使牠可以成為一種農民之揚氣傲岸的；可是這揚氣傲岸不是別的，實在不過一種對於為自己和它人的道德效果的覺悟而已。最寒苦的一位散工，如果他一想到，他不獨為自己餬口，乃亦是為他的全家而工作的，那他登時便會覺得自己的價值增高，而不知不覺便要督促自己最嚴重地去工作；可是這全家，在他，便是整個社會底一個小影了，因為養育他的全家，使全家快樂，全家到高尙地步，這在他，覺得是一種道德的，宗

教的義務，而在爲他的兒童起見博取利益的現像中，他感覺到他的效果，他的成功底神聖，爲他自己和爲人類。所以說，如果工作只爲的是賺錢，只爲的是衣食之資，那這便是牛馬之工作了。僅只試一思及這個情形的個念頭，便會使人類底精神界內起叛逆的。社會上那羣最精細的，精神的逸樂家，那宗怪人，它們總在讀，在閱，可只是爲使自己娛樂，它們總在只知取，而永不知給與，我們公平判決，便要覺得，它們對於工作與工作效果底道德力量所具有的覺悟底程度，因而亦然對於工作之榮譽所具有的程度，俱皆下於上面所說的那位作散工的工人的。

任何一個人，僅只在自私自利的享樂中，以它所承襲的產業底利息爲生活時，那它根本便是一個最貧窮的人。因爲它只是在攔握着利益底影子和效果底影子。只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粗野人纔能羨慕這宗「富貧人」的。

效果與利益因爲都是工作底目的，所以往往固然不可分離地互相繞纏，但是在理論方面却不應當不分開。工作底地位越高，越趨向精神方面和獨立色彩，那這兩種目的即在實際的生活中也要愈加分明地彼此分立，並且一個工人愈有學識教養，那效果與利益底區別愈要了然地生存。



於他的腦中。在那些無教育無學識，略能以手頭幫助和作助手的工人們——無論生活，無論理論方面——都是利益掛在鼻尖上，效果處在雲霧的遠處，他們絕瞧不見的。教育與學識是一支望遠鏡，牠會很清晰明亮地把效果由遠處給我們取至眼底。無論甚麼人，要是能給一切作工的人們燃起對於效益，效果的意識，那他便是在民族底神魂中建立工作上的大和諧。關於利益的赤裸學說會破裂社會底和平安謐，因為這宗學說只能呈示產業與工作之間的冷酷，不公平，不調和，而並沒有一句最後調和疏解的言詞。因此共產主義者便永久是攪亂和平者，因為它們只知講論分配不平等，可是往往僅外面瞧着不公道的利益，而並不知講論效果上具有和解力量的神聖的公平公道。

即連「利益」(Gowinn)「這一個名詞在德文裏也還更藏有一個思想，以為物質方面的產業謀求並不是自身的目的，以為利益在利益這個名詞底思想中是有趨出自體之外去的目標的。關於這一點的證明，我們可以從消極方面來加以陳示。因為為純粹自私自利色彩的利益，在我們是還需要一個特別名詞的，可是「利益」之名詞却不能賅括這純粹私利色彩的利益的。不過關

於這一點，在我們德國竟這樣地不順利，簡直使我們舉不出一個妥善的名詞來了；所以我們便只贈給了牠一文已經磨得光光的外國副幣，這塊副幣是我們在到法國首都巴黎去的道路上所捨了來的，於是我們便稱呼純以私利爲目的的利益爲法國名詞的「Profit（盈餘）」了。

真正的文化在一個民族裏發展得愈高，那效果與利益的思想在普通一般人們底意識中就要愈分得清楚的。一個有教育的民族過分地重視利益，因而竟忘了效果底神聖，那它們便算是走上了販夫底道路了。販夫底精神是一種社會的病症，猶太人民曾沈沈重重受了這個病症底傷害，而在北美這個弊害簡直變成了一種地方病症，而那對北美人民的譏諷稱呼「揚其（Yankee）」和它們的表兄弟，英國人，俱都是爲了這一種病症的原因，而竟成了口頭語了，和猶太人一語的意味一般。

如果一個民族能把效果與利益底區別瞭解到了牠全盤的深處，那這一個民族對於效果的重視一定也要非常高出於對利益的重視的。在這一點中同時便是給民族精神產生對工作榮譽最高與最純潔的觀念之所了。

## 民族勞作

人類不僅就人類底本身說，是一個「個人」；即連它處家庭，處階級，處種族，處民族的「公共生活」也是要向個人色彩方面開展的。我們在組團中和種屬中，又還更是一個精神方面的個人，因為我們個人自由的操活動，便是共同組織我們公共生活發展的材料。

因了這一個原因，人們便可以講論一種之「民族人格 (Volkspersönlichkeit)」了，就是人們理解全民族為「一個一致的」性格。一個民族愈由自己確定自己的力量裏面向外發展，那它們對於民族人格之榮銜便有更大占用的理由了。但是即便在最粗野的原始民族裏，這一種民族人格底根芽已經潛然隱伏着的。在最廣泛，但同時亦為最深邃和最天然必須的意義之下的民族人格，便是各國固有的民族——所謂原始民族與自然民族。

「國粹」到了現在，是一個神聖的名詞了，可是恰切因為這個名詞是我們這樣神聖視之的，

所以其它一方面現在也竟有些爲鬼爲蜮的人們能得這樣便利地藉以發揮它們那惡德惡行了。要是一個人不懂這個名詞底意義時，那它至少要信仰牠的。這確乎是有理由的。因爲如同一個人要想當一個正經人，就應當明瞭自己，和信仰自己的情形一般，一個正經的民族也是應當明瞭自己 and 信仰自己的。對於歷代所傳流下來的民族人格底自行瞭解，便是民族意識。如果一個民族在其存立底天然基礎中，就是在它的「種族，語言，習俗，和移植地」等等情形中會明白是應當化而爲一的，那這宗意識便會給它榮盛，而透入它的一切思想，感覺和行動之中。在上古自然民族底時期，我們德國人民卽已成爲鞏固的民族，當在我們後來演成「國家民族」時，我們便以這民族底根柢而發達了起來。直接在國家獨立戰征之後，大哲學家海格爾（Hegel）在他那篇有名的就海  
德爾伯大學（Heidelberger Universität）教授之職的演說辭裏曾說：「德意志民族已經將它們民族上的粗重工作完成了，因爲它們救出了它們的國粹，換言之就是救出了民族一切生機充盈的生活上的基礎。」這所謂國粹便是指那四個以大寫S字母爲起首第一字母的名詞，就是種族（Stamm），語言（Sprache），習俗（Sitte）和移植地（Siedelung），這便是一切生機充盈的生活

上的基礎，一種原始基礎，牠的存在遠超各民族變易無常的國家生活之上，而隨着民族最末後一口呼吸，方行崩潰的。

然而如果要說工作具有使人們愈久愈個性化的福惠能力時，那工作在人類個性底集體上，就是在民族人格上，自然也不得不發生同樣効力的了。

至於說各種族，和民族的天然基礎究竟怎樣發生，以及各民族當初怎樣會各自分立，這個啞謎至今仍沈潛有史前時期底幽暗之中。可是這一種分立，此後怎樣逐漸增進地個性化，那宗天然基礎怎樣漸次鞏固與擴充，其它一方面竟也衰疲與倒塌，這種種情形却是我們在歷史底光亮中瞧得清清楚楚的。

這種種情形，換些話，總束起來說，就是上帝底意志令各民族彼此分立，而將各民族個性存在上的基礎特徵當作一種天然資稟賦與了它們，但是各民族底自由意志竟瞭然地與欣悅地堅持着這宗民族性格上的特徵，更且使之進化，使之向高處去，使之爲一切愈加高超，兼且自由的公共生活之源泉。

這是一種作爲了，並且還是一種人格和道德的作爲，就是所謂「民族之建設」，「民族之勞作」的了，由這宗建設與勞作，我們纔能保持與繼續發展我們的民族人格。

在任何一個民族裏，都隱伏着一種幽暗的感想，以爲一個民族在各民族底圈環裏是不得不以固有的，惟獨它們所自具的建設勞作底方式的效益，來呈示它們是個體個性的。

因此那便是有理由的了，各民族皆援引久已消沈在以往時代裏的民族建設上的偉大事業以自重自保。譬如意達利國的人們總在稱道它們在默邸濟 (Medici) 名族時期在商務、藝術與科學等方面的偉大建樹，以便確證它們現下可以稱得起「國」，稱得起「民」的權利！先賢先哲底建樹爲後起輩代身價高貴的佐券，在民族方面是還要較比在個人方面加重的。在工作與建設之光榮裏，處處竟皆藏有這樣深邃的魔力哩！

懶惰腐敗的民族，自然是要被勤奮努力的民族「在工作方面淘汰了去的，」它們也是勿須施以強暴，而會自行消滅的，因爲它們不能保持它們民族人格的緣故。歐洲大移民底歷史裏面曾多次呈現一種事例，就是處處打勝仗的野蠻民族都居留於被它們所打敗的文明民族裏，而完全

被這文明民族所吸收。於是戰勝者便會喪失它們的民族精神，反而被戰敗者以工作淘汰了它們，所以僅只在戰征殺伐的工作中有能力，而在較高和平工作中無能力的種族竟要無踪無影地沈淪，彷彿地球把它們吞了下去的一般。

在小處與此類似的情形，我們一直到今日，在我國仍還能見得到。如果能有一批較為勤勉，較為狡猾的新移民注入敗落了的城裏頭來，而這城裏頭的市民們因見到交通底危險，已失落了膽量，因受舊日習俗習染底影響太深，而懶惰懈怠，因居處閉塞，而心性木鈍，像這樣的些舊家族都要日漸歸於消滅之途了。它們勢必墮落，勢必滅絕，勢必消失；簡言之，它們這便叫作被工作所淘汰，而百年之後，這樣的些城市內差不多便要都是新人物，新姓名，新門第，新家族了。

使美洲印第安民族滅絕的那所謂「白種人底吹息(Hauch des weissen Mannes)」往往却並不是別的，不過個性工作之吹息而已，可是在勤勉操作，共同競爭的民族，則為一種生息，而在那衰疲無能的民族，便要成了一種致命的毒息了。

在這一宗被工作淘汰的民族之旁，立於對反補充地位的，便是那些根據個性工作之能力雖

經種種政治方面的惡運，仍能保存於水面，而永不沈淪的民族。





## 出版者附言

維廉·亨利·黎耳氏 (Wilhelm Heinrich Richl) 生活于一千八百二十三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間，所以差不多便是和保爾·得·拉嘉德氏 (Paul de Lagarde) 同在一個時期裏的。但是另一方面，拉嘉德底政治特性到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後的時期纔得充分發展了出來，並且還是由對「第二國 (Das Zweite Reich)」的不滿意中吸取他的力量的。一方面，黎耳就其全盤的性質說，是苗根在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前的時期裏的，還要再確切一點說，就是苗根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那既具有令人失望，而亦具有促進力量的經歷之中的。一方面，拉嘉德過於強勝的政治熱情在那一批畢斯默 (Bismarck) 時代未經解決的國家問題上方行十分地燃燒了起來，因而竟使他成了這個時期裏的一位孤立的人物，一方面，黎耳為政治所確定的強度稍見減殺的天性，使他在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國政治失敗之後，便退入所稱之為「政治的先驅學識」之中 (Vorpolitik)。

tisch) 而這一宗政治的先驅學識，換言之，即對於德國民族生活和德國民族性之研究，自是之後，便成了他的故鄉，嫻習通達，允稱此中專家了。

他的四大本的宏偉傑作題名：「民族之自然史，一種德國社會政治之基礎 (Die Naturgeschichte des Volkes als Grundlage ein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這個題名對於黎耳著述底地位，價值，與限界，已經差不多全都劃出輪廓出來了，而他對於我們現下時代的重要性於此亦可概見。他是首先出來揭示人們今日所稱道的「自立性民族 (das eigenständige Volk)」與「國粹政策 (Volksumpolitik)」的人物，換言之，他的貢獻便在揭示實際上的一種真實事例，所謂真實事例，即：惟獨那一宗由民族本質本色的生命律則中所發展了出來的政治，纔能同時既富有意義，而亦富有效益之謂。可是如果要說，那是對了的話——而那却真是對了的——一個民族最深邃的生命律則，永不能為一位即便加倍懷着熱情，以作研究的科學家之所完全瞭解認識，而永久總要是為一位直接由歷史的瞬刻瞬機底默默授中，以施展創樹手腕的偉大政治家之所徹底瞭解認識的，那人們即連黎耳這貢獻上為時代性所闖局的限界也要予以承認與敬重。

的。不過無論如何，他這貢獻上總還有許多部分即在今日，更可以說，恰切在今日，又給我們發生出來活躍的價值的。他識出「農民」，「家族」，「習俗禮法」與「工作」之四大現象為一種健康民族生活和一種健康民族政治上永不能磨滅的基礎，並且更以一種印像深刻的方式加以敘述，他這敘述無論怎樣透着對於市民階級的傾向，但市民階級那可疑的，社會與政治的性質却絕未曾脫出了他的犀利的眼光。

我們眼前這本關於黎耳上述著作的節本，是要嘗試着把它這著作裏在今日完全於一種新的與燃燒的方式裏又成爲重要的部分都摘取了來，編列一齊的。不過在這兒，我們還須聲明一句，就是一位社會政治家尙不足盡全部之黎耳氏的，他還是一位漫遊家和描寫各地風景人物的妙手，這是我們在他所著的那部「漫遊記」(Wanderbuch)裏可以見得到的，最後他還是一位詩人，著有七部「長篇與短篇小說」(Geschichten und Novellen)，這都是使他永久青新少壯地生存於我們民族之間的。

論德國民族性

一一八

維廉·呂斯來 (Wilhelm Rössle) 識

## 論維廉·亨利·黎耳氏

維廉·亨利·黎耳氏，並不是一位了不得的偉大人物，也並不是一位所謂「生來的天才家」，他只不過是一位優異能幹的人物而已。但他所發出的效力影響，却決無可疑他與一位偉大人物所發出的效力影響完全相同。在今日較後一代人們之中，幾乎連一個人都不會知道，他曾作有甚麼樣的貢獻，並且他對德意志民族的價值怎樣，但是我們較前一代，還曾經歷親炙過他的人們，沒有一個能得以擺脫掉了他的影響的。譬如說我，便視之爲我這一生真正幸運事件之一，當我在大學充當大學生，而他那已出版，包括「鄉土與鄉民 (Land und Leute)」，「平民社會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以及「民族自然史 (Naturgeschichte des Volkes)」中的「家族 (Familie)」部分，此外還包含有「文化史短篇小說 (Kulturgeschichtliche Novellen)」與「三百年之文化研究 (Kulturstudien aus drei Jahrhunderten)」等著作的五部集子落入了我

的手中時；在科學方面，並沒有一個其它的人，在文藝方面，除葛德與莎士比亞（Goethe u. Shakespeare）之外，再就是還可以說除耶賚彌亞斯·杲特赫爾扶（Jeremias Gotthelf）與赫貝爾（Hebel）之外，也並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為我的精神發展，以及也在永久的人生價值方面，給與了我這樣多的食糧。爲了這個緣故，我自然是要來拒絕大歷史家亨利·封·特來赤克氏（Heinrich von Treitschke）批評黎耳氏所說：「黎耳氏竟以憑空的歷史直覺，來代替實地上歷史的認識」的那句話了，並且我不得不微笑了起來了，當在我在一位時下主張國家思想的歷史家底著作中，讀到了下列一段批評黎耳的言詞時：「他在任何一門學識中（音樂史一門學識或許除外），嚴格地說，俱都不是專門家；他在各式各樣領域上，嘗試他的才力，但却無一處能有獨立的研究工作。我們並不是有這樣高傲的脾氣的，並不是只要去向那些專門學者們領教的。任何一位無成見偏見的人，沒有不願受他那些親切有味，而情趣精雅的著作底影響，並且爲他著作中所給與他們那許多有價值的鼓舞啓發，都會很感激他的。然而那終究要是確定不移的事實的，科學方法底準確，在他始終不能施用得得心應手。有時人們竟把他視作了一位歷史科學之改良家。這，他

完完全全不是的，而他因他那天然謙虛與可愛的稟性，也絕對不作這宗想頭的。如果他說文化史是一種將來的科學，那他便僅以給這門科學弄了點子建築磚瓦來的貢獻自相滿足了。」這話可是說得不錯不錯的哩，所謂科學方法底準確，那是每十年管保會變個樣兒的！到了晚年的黎耳，却有一種準確的國風國粹知覺，以及一種天賦的觀感力，而對於這兩點，特來赤克氏底評價，未免有點過低了，並且更因為黎耳氏底全部人生給他自己豐富富弄來了一批人生知識，所以他便以一位天賦的社會政治家，文化史家，民族學家，所能給與我們的貢獻，當然要會較比幾塊建築磚瓦加多的了，他所貢獻給我們的，竟會是由他國風國粹的精神裏所產生了出來的一幅整個世界構形的。這一點，即連在剛纔所說的那位時下歷史家到一定的一個程度之下，也還不得不承認的，因為他在上面所引那一段言詞之後，又繼續着說：「此外他的特質，就在他能以一位社會保守主義著作家之身分出來主張保存民族生活內之種種歷來傳流的原素要素。他反對一種使一切俱皆均平齊一的自由主義，並且要求社會上的一般人士，親自去在民族真正的特質裏，直接研究一研究民族，就是研究一研究德意志民族。他是生活在浪漫主義（Romantik）底思想裏的，並且他所



據之以爲出發點的，尤其是歷史的法學派之根本思想，因爲他是要嘗試着在文化生活不同領域上民族所表現的鑄形裏以瞭解民族之精神的。」這是這位時下歷史家底第二段言詞。可是我覺得黎耳並不是一位浪漫派，縱然人們斷定他是自健康浪漫主義 (*gesunde Romantik*) 出發的，我覺得他絕對是一位有實際眼光的實際主義者 (*Realist*)，因爲他並不作夢想，他只是實地觀察。況且他的觀察却還是較比大多數與他同時的和今日習見的人們底觀察強盛得多了的——這是德意志人民最新近的發展業已明明白白證明了的——這樣他便是最有希望，可以爲我們當前時代決定的民族性主義方面的領袖的了。

觀感，是詩人底才智；天生的歷史家，總要是部分的詩人的，雖然他也並不是直接以詩人底位分去從事工作的。這是維廉·亨利·黎耳之所作了的，證實了的，他是德國短篇小說作家中最奇特而堪注意的一位。關於他在短篇小說作家方面的精神發展，以及關於他在結構短篇小說形式方面的特質底發展，在他所出版的六部短篇小說集子底敘言中，俱皆完全清晰地說了出來，所以我們在這兒便可以用他自己的話，把詩人的黎耳氏底特徵與作風完全描畫了出來了。無論怎

樣，他這些言詞中最重要部分，我們總可以摘錄在下面的。一八七四年黎耳在他所出版的「到犄角之外去 (Aus der Ecke)」短篇小說集之敘言裏，曾寫了下列一段文字：「二十年前，我住在民欣城 (München) 之西北角，斜對過住着艾瑪奴愛爾·蓋貝爾氏 (Emanuel Geibel)，在一條離這兒不遠的街道上住着保爾·海依賽氏 (Paul Heyse)。因為我們其餘文藝方面的友朋們，俱係深深住在了城市之內，所以我們三個人，便彷彿是被置於最前線上的哨兵一般了，因此我們就稱呼我們三人爲「犄角社 (Die Ecke)」。我們極盡我們鄰居之誼，並且在蓋貝爾底主持之下，我們這犄角社，不久便成了一個結品的核心。每逢星期日，我們便偕同我們的太太們，都到一位熟識的老太太家內大廳裏來聚會，這位老太太所住的地點，便是在我們這個犄角的頂尖上。在這兒我們大家歡樂地團聚，彼此互相談論我們最新的作品和計劃，我們向大家宣誦我們已經完全完成了起來或完成了一半的作品，並且彼此對於日常文藝方面與藝術方面各種現象互相交換意見：

：當時在巴燕國王馬克西彌良二世統治下的民欣城內詩趣的空氣，處處繚繞着我，發生着催迫，啓發的效力，於是我便寫了些短篇小說出來，一開頭本只是爲犄角社內的同志們寫，其後也竟爲

社外的人們寫了。——這話並不是要說，這彷彿就是我第一次所創作的些短篇小說了！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就令一種軟性的刊物登載我第一次所寫，幸而久已忘却了的短篇小說，自是之後，我却暗中無時不爲一位短篇小說創作家，不過自己總覺自己天分過低，深深引爲愧憾而已。但是在犄角社成立期之前，我所寫的些短篇小說之中，大半都沒有甚麼價值……犄角社內的批評，在這一點上，才給我把眼睛打開，使我的迷惑得以解除，我尤其感謝我的良友海依賽氏，因爲他雖然僅僅只匆匆說了幾句話，然而已竟可以使我對於短篇小說之性質與短篇小說藝術之奧祕，首先獲得了一點光明……這樣我第一批略少認爲有點可保存價值的短篇小說，便被爲犄角社而寫了出來，並且更被在犄角社之批評火焰中加了一番檢驗與鍛鍊。」一場重病之後，黎耳以一位精神復元的人，纔開始切實向創作方面深入，並且於一八五六年，那麼他已經是到了四十四歲了，就把他那「文化史短篇小說」(Kulturgeschichtliche Novellen)底全部俱都寫了出來，這時他對於他這短篇小說形式之使命與特質，也已經有些清晰了，因爲關於這一點他曾說：「誰要是腦子中不曾負載有前人所寫那些年代志略，誰要是不能生活在歷史上遠遠的空間裏，那他僅只能寫些板

滯的歷史短篇小說的……假使我不會充當了文化史教授，假使我不會年復一年地澈底領略了我們德意志歷史，況且還又是在大學青年團體之中，那麼我的那些短篇小說勢必很難獲得那各式各樣的歷史色彩了，這色彩無論是好是壞，却終究要是我這短篇小說之特徵的……內裏經驗吟味過來的短篇小說，我愈寫得多，我愈加清晰地認識了出來，短篇小說之所能及敘述的，除了心理上一個問題之衝突外，不會是別的了，這個問題之衝突，藉一事件故得以解決，而出之以節儉緊湊，申述報告之藝術形式。一個作家寫作得愈多，愈真摯，那它就愈要少用藻飾渲染，反省思議之筆，就愈要趨於簡鍊，愈要用字少了。」這一段言詞之後，他還繼續着報告說：「當在我因了這個緣故把短篇小說底真正性質認識了出來之後，我就決斷寫五十篇短篇小說出來，使之成爲包括一個人一生嚴重工作的一部總集，而根據這一部總集，人們便可以稱呼我爲一位短篇小說家了。」他所說的這五十短篇小說，他也果真完成了起來，「八篇文化史短篇小說集 (Kulturgeschichte-liche Novellen)」之後，以次繼之而寫出的，便是十七篇封面題贈路得微·利禧特爾氏 (Ludwig Richter) 的「舊時代故事集 (Geschichten aus alter Zeit)」，七篇「新短篇小說集 (Neues

Novellenbuch) 再就是七篇「到犄角之外去 (Aus der Ecke)」的集子，六篇「在宴息的晚間 (Am Feierabend)」以及五篇「人生之謎 (Lebensrätsel)」

在對他最末一次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子「人生之謎」(一八八八年出版)所作的序文中，黎耳寫下了一段彷彿對他全部創作展望一般的文字，他說：「我的計劃，是要以一位短篇小說家在千餘年來德意志文化史裏作一次穿行，自第九世紀起直至十九世紀，我這個計劃，幸而與我業已成功，我竟能將這樣的一次穿行得以弄到了底。我所寫的短篇小說中任何一篇，就本體上看，都只是小小的一幅世態畫像，然而每一篇短篇小說，皆有牠一定的歷史背景，於是這樣所有我寫的短篇小說，竟都匯聚成了一幅偉大的歷史總畫像。」這尤其是因為他所寫的一切短篇小說，都是在德意志民俗民風內樹着根基，都是由民俗民風內來的原因，所以他又繼續着說：「我開始作小說，純粹出於我愛作小說的性癖，絕沒有其它目的。這一點一開頭，就是我至重要的意向，而後此也始終不會不是我的至重要的意向的。可是我們作小說，我們述說故事，總是最愛述說我們所喜愛的事體的，而我所喜愛的尤其是我們德意志的民族和鄉土。因此我所寫的小說，我所述說

的故事，時時悉係演現於德意志的鄉土上。可是所謂民族，永遠不僅僅是現在；所謂民族，無一不是不間斷地活躍與穿梭於歷史演變與消失之中，那麼誰要是理解他的民族爲一個活躍的團體時，他就應當堅定地回首向一代一代已經過去的同胞們囑望，如同向眼前生存的一代同胞囑望一樣；他在當前的時代裏，總要同時瞧見過去的時代和將來的時代。從前的浪漫派文藝家，無不愛由眼前的時代逃避到一個往往僅只夢想的過去時代，這未免有點過於狹隘了。在今日，許多詩人與藝術家，則相信，藝術是應當逃避過去時代的，以便可以完全向着我們時代底特徵與事業裏深入，這亦然是過於狹隘了。我在這些短篇小說裏，保存着大一點的和自由一點的眼界，就是我既搜尋了我們民族已往的時代，而亦不會逃避了我們民族底當前時代。——這便恰切是我上面所稱之爲黎耳氏底健康實際主義了。可是他也沒有漩入了寫實派的狹隘之中去，這位詩人保存了他的作品和超現實而永存永在的事物底連繫，因爲他又繼續着說：「我們站立，生活與穿梭於我們民族之中和時代之中，這樣我在我的短篇小說中，所描畫個人底性格與它們的遭遇，都是與全民族底性格和歷史的段落互相爲依據的。但是任何一至渺小的人生，也是全世界內和一切時代內的

一份子；因爲它也是立脚在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網之中，他也是立脚在上帝所創制的廣大宇宙秩序之中的，而這秩序，令我們在我們自己渺小存在底種種際遇裏，更恰切覺得彷彿是世間最大之啞謎的了。縱然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身上經驗了，或在他人身上察見了一件至快樂的，或至嚴重的事件，縱然這事件會達到了一個可喜的或悲壯的結局：——那這總要是「偶然」在那兒作祟作怪的。偶然！一副虔誠的，深於宗教的性情，不知有所謂偶然的；因爲所謂偶然，在它是恰切視之爲至必然的，立於我們自由意志之上的，——就是立於上帝意志之中的，就是大宇宙啞謎之中的個小啞謎的。因爲每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說，無論牠把心理上的問題解決得多樣至爲清晰——無論牠說的是我們奇思怪想，我們興趣的忽此忽彼，或無論牠所揭除的是人類情感慾上的至激烈的，幽邃鬼魔的情況與否，這在讀者方面，同時總要是一個『人生之謎』的。」爲了這個緣故，黎耳就以人生之謎的字樣，名他最後一本的短篇小說集子了，而他於一八八八年所寫最後一篇短篇小說，竟也名之爲：「上帝之公道了（Die Gerechtigkeit Gottes）」如同一切真正德意志人們一般，他也是一位絕對虔誠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天性的。

黎耳氏把他所寫的短篇小說分成了七組俱係按照各小說內所述說事故之時代而劃分，所以我們也只好在這兒把五十篇短篇小說連帶各篇小說寫作年限以及幾種愈加確切之報告悉行開列於下（不過一八六七年出版之「新短篇小說集（Neues Novellenbuch）」中所收各短篇小說寫作之年限却未能一一列出）內容關於最前時代之創作：「愛情之懺悔（Tiebesusse）」（一八六二年作）內容係敘述國王少皮賓（Pipin der Kleine）時代君士坦丁湖島（Bodensee-Insel）上的一件戀愛事故，「國王嘉爾與莫落爾扶（König Karl und Morolf）」（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述阿痕與銀格爾赫穆（Aachen und Ingelheim）兩個地方上的一件事故，「死亡之書（Das Buch des Todes）」（一八六八年作）內容係敘述第九世紀南部瑞典（Schweden）之事故，「在崇奉真主的年月裏（Im Jahr des Herrn）」（一八五五年作）內容係敘述八百五十年隆河（Rhön）畔的事故，內容關於浪漫派盛行之中古時代之創作：「老狗（Der alte Hund）」（一八七八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二三二年西根、西林與馬堡（Siegen, Westerwald und Marburg）三個地方之事故，「上帝之公道（Die Gerechtigkeit Gottes）」（一八八八年作）



內容係敘述一二六八年至一二八九年哈吞誥 [Hattengau] 地方之事故)、「當初無異今日

(Damals wie heute)」(一八八一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三四〇年君士坦丁湖 [am Bodensee] 畔

之事故)「聖燭節之青年 (Der Dauchs auf Lichtmess)」(一八六一年作)內容係敘述騎士時

代刷本 [Schwabens] 地方歸德意志帝國直轄之一小城市內之事故)「同嗣子 (Die Ganerben)」

(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述十四世紀萊茵誥 [Rheingau] 地方之事故)「沈默無言之議員

(Der stumme Ratsherr)」(一八六二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三六八年維次拉爾 [Wetzlar] 地方

之事故)「音樂家之子 (Das Spielmannskind)」(無創作年限)內容係敘述十五世紀上部艾

爾撒斯 [Oberelsass] 地方之事故)內容關於宗教改良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之創作)「十四位

救急救難之神聖 (Die vierzehn Nothelfer)」(一八七二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五三八年南部德

國之一帝國直轄城市之事故)「上帝報答你 (Vergelt's Gott)」(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

述一五三八年奧格斯堡 [Augsburg] 地方之事故)「一位古典學者之修業年限 (Die Lehr-

jahre eines Humanisten)」(一八五六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五六一年及以次各年份武爾目與

奧格斯堡〔Ulm und Augsburg〕兩個地方之事故，)「第二請求 (Die Zweite Bitte)」(一八七一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五七〇年德國境內之一公爵國之事故，)「我的權利 (Mein Recht)」(一八七五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五七七年荷耳斯坦〔Holstein〕地方之事故，)「月耳格·木肯忽白氏 (Jörg Muckenhuber)」(一八六〇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五九四年諾得靈根〔Nördlingen〕地方之事故，)「旺達·察露斯加氏 (Wanda Zaluska)」(一八七四年作；內容係敘述三十年戰爭時期波蘭與苦爾蘭〔Polen und Kurland〕二國境內之事故；)內容關於三十年戰爭時期之創作：「美之呪殃 (Der Fluch der Schönheit)」(一八六二年作；內容係敘述納騷國境內維爾堡〔Weilburg in Nassau〕地方之事故，)「正當的母親 (Die rechte Mutter)」(一八六三年作；內容當然亦係敘述納騷國境內一城市之事故，)「慈善事業 (Die Werke der Barmherzigkeit)」(一八四六年與一八五六年作；內容係敘述狼河畔倫白〔Löhnberg a. d. Lahn〕以及納騷境內貓肘〔Nassau-Katzenellenbogen〕等地方之事故，)「伯爵夫人烏爾蘇拉 (Gräfin Ursula)」(一八五六年作；內容係敘述一六二九年及以次各年份納騷境內哈達馬爾〔Hada-

Bar」地方之事故，內容關於珍奇怪異與雜亂斑駁風尚時期（Barock- und Rokokozeit）之創作：「醇酒（Reiner Wein）」（無創作年限；內容係敘述一六六四年至一六六六年門河畔弗郎克府城〔Frankfurt a. M.〕之事故，）「謙虛之大教訓（Die Hochschule der Demut）」（無創作年限；內容係敘述一六八三年巴哈拉哈〔Bacharach〕地方之事故，）「公爵與首相（Fürst und Kanzler）」（一八七九年作；內容係敘述一六六〇年一邊疆伯爵國內之事故，）「奧微德之在朝中」（Ovid bei Hofe）」（一八五五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二四年納騷（？）境內之事故，）「萊茵語地方的人們所說的德國話（Rheingauer Deutsch）」（一八七四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〇九年萊茵谷中之勞恩塔爾〔Raenthal im Rheintal〕地方之事故，）「隨侍醫士（Der Leibmedikus）」（一八六一年作；內容係敘述十八世紀德國境內小邦之事故，）「未曾書出之信札（Ungeschriebene Briefe）」（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述路得微禧十四世〔Ludwig XIV〕城市伯爵國啓欣北〔Burggrafentum Kirchberg〕之事故，）「阿穆非昂（Amphion）」（一八五六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二〇年耶納〔Jena〕地方之事故，）「歷史之謊言（Die Lüge der

Geschichte」(一八六二年作；內容係敘述十八世紀巴燕國山嶽地帶[Bayerisches Hochland]之事故)「宮堡納依德克(Burg Neideck)」(一八七六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五七年維斯泰與「Westeran」地方之事故)「築室(Der Hausbau)」(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述七年戰爭時期德國一小城市內之事故)「城市樂師(Der Stadtpfeifer)」(一八四七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六〇年及以次各年份維爾堡「Walburg」地方之事故)「禽鳥之愛護者(Demophoon von Vogel)」(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八〇年以後維耶納都城之事故)「馬丁·禱爾德布朗德師傅(Meister Martin Hildebrand)」(一八四七年作；內容係敘述一七九九年微慈豪森「Witzenhausen」及可恩「Köln」二地方之事故)內容關於革命時期之創作「妖魔戰門(Gespensterkampf)」(一八六二年作；內容係敘述下部瓦斯諾「Niederwassgau」地方之事故)「幾曼先生之髮辮(Der Zopf des Herrn Guillemain)」(一八六三年作；內容係敘述門次與門河畔弗郎克府城「Mainz und Frankfurt a. M.」之事故)「四絃合奏(Das Quartett)」(無著作年限；內容係敘述奧國什推呂德宮殿「Schloss Struth」內之事故)「幸福的友朋們」

(Die glücklichen Freunde) (一八七四年作；內容係敘述粉肯保恩[Finkenborn]地方之事故——惟此粉肯保恩地方並未經註明係吉森[Giessen]境內或馬堡[Marburg]境內之粉肯保恩，「以慰藉換慰藉」(Trost um Trost) (一八七四年作；內容係敘述犁富蘭 [Livland]之事故)；內容關於新時代之創作：「晚間之安息 (Abendfrieden)」(無著作年限；內容係敘述一八三〇年左右比布利禱[Bieberich]與微斯巴墩 [Wiesbaden]兩個地方之事故)；「文壇階梯 (Gradus ad Parnassum)」(一八八五年作；內容係敘述一八三九年維耶納之事故)；「瘋狂之荷蘭人 (Der verrückte Holländer)」(一八七三年作；內容係敘述維爾堡 [Weilburg]城內及郊外之事故)；「其父之子 (Seines Vaters Sohn)」(一八七九年作；內容係敘述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七三年比布利禱[Bieberich]地方之事故)；「三月革命時期之大臣 (Der Märzminister)」(一八七三年作；內容係敘述一八四八年德國境內一小邦之事故)；「舞台之子 (Das Theaterkind)」(無著作年限；內容係敘述一八四九年微斯巴墩 [Wiesbaden]地方之事故)；「詩人試驗 (Dichterprobe)」(無著作年限；內容係敘述農民所居住山岳地帶之事故)。

「失去的樂園 (Das verlorene Paradies)」(一八七九年作；內容係敘述鐵利耳 [Trier] 以及艾爾北菲爾得 [Elberfeld] 兩個地方之事故。)「療病之泉畔 (Am Quell der Genesung)」(一八八〇年作；內容係敘述波棉 [Böhmisches Land] 地方之事故。)人們由這所開列的目錄中，可以瞧得出來，黎耳所寫內容關於珍奇怪異與雜亂斑駁風尚時期之小說數目，是超過內容關於一切其它時期之小說數目的，人們由此亦然可以能明白，黎耳底精神尤其是爲這個時期之所吸引着的，因爲十七十八世紀之宮廷生活，恰好是能把一大批問題貢獻給他，並且與這宮廷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更是音樂生活，而這音樂生活，却就是黎耳底專門學域了。他所寫的短篇小說中，一大部分也是演現在他這位詩人底家鄉裏，就是在納騷和鄰近的萊茵區域中的——這樣他在寫作時，總能時時刻刻皆係腳踏實地，而不至於捕風捉影的胡寫了，有一次他也還會親自說明，在他所寫的小說中，是把一大批家庭傳說改造了出來的。

把他這每一篇短篇小說之特質特點，都詳細地一一提示了出來，這在這兒可惜是不可能的。在我個人方面，尤其習熟，而時刻不能遺忘的，便是他所寫的「文化史短篇小說」這是我總要讀

過三四遍的了。譬如說「在崇奉真主的年月裏」一短篇小說中，關於外教與基督教之間的衝突，其敘述之簡短緊湊，又譬如說「一位古典學者之修業年限」中所敘述那些有趣味的麵包房夥計之經歷，在「伯爵夫人烏爾蘇拉」短篇小說中所描寫的這位卓越秀逸的婦女典型（「在信仰中堅定不搖」）在「慈善事業」作品中所描寫三十年戰爭時期之沈悶鄉村空氣，他所描寫的那珍奇怪異風尚時期裏的一位多才多藝之藝術家巴羅紐斯（Baronius），人物之可驚奇，「奧德德之在朝中」作品中，關於宮廷生活之非常活躍的描敘，「城市樂師」中之真正小城市情趣，以及此種情趣中所產生之人物，最後「馬丁·禧爾德布朗德師傅」中所描敘的那些忠信誠實的工匠伙計們底回憶，凡此種種優勝之處，無時不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無時不在活躍地使我置身於往昔的時日裏。黎耳自己曾說，他較後所寫「舊時代故事集」是較比「文化史短篇小說集」還要真摯得多了的短篇小說的，並且那當然是毫無疑問的，黎耳愈到後來，就愈有所學，而手腕亦愈高妙了；可是無論怎樣說，在「文化史短篇小說集」中所隱藏作者個人的印像，却至爲豐富，況且其中也還透露着作者一定的一點勃發朝氣——「舊時代故事集」第一部所收各篇作品中，我

極願特別提出，而加以讚揚的，便是「沈默無言之議員」這位議員用他的家犬顯示一個人底教育，此外便是「美之呪殃」的一篇作品，這篇作品是敘述三十年戰爭時期一位品貌畫像一般美麗的裁縫師傅之子底重大遭遇，這部集子第二部所收各篇作品中，我要特別提出讚揚的是「築室」一篇作品，黎耳這一篇作品，我覺得，是與短篇小說大作家克來爾氏（Keller）底作風最相切近的了，這部集子第二部中這一篇之外，就是「未曾書出之信札」一篇了，這篇作品敘述路得微禧十四世（Ludwig XIV）時期之事故，是給一個令人可敬重的德國公爵國畫了一幅影像的，再就是那篇寫得真正是德國中古時代風味的「同嗣子」的作品了。「新短篇小說集」中，特別值得人們稱道的，便是「晚間之安息」的一篇，這一篇敘述了黎耳幼年中小學時代之回憶，「舞台之子」一篇，敘述了作者個人一八四九年之舞台回憶。「樂師之子」是一篇重大的發展個人性格之作，「四絃合奏」在這一篇中大音樂家海盾（Haydn）竟曾出現的，也是這樣一篇發展個人性格之作。「到椅角之外去」的短篇小說集子中，「十四位救急救難之神聖」這本來是一篇滑稽可笑的畫師故事的，却是社會上幾乎無人不知之作的了。「三月革命時期之大臣」決定



地也是一篇堪稱關於一八四八年一幅很好的時代畫像之作的。「萊茵誥地方人們所說的德國話」在這一篇作品中，人們可以發現了我們德國人們現在在這法國人新興盛的時期裏，都應當說的一種德國話的。——「在休息的晚間」這部短篇小說集子裏，所收各短篇無一不佳，無一不珍貴，其中：「失去的樂園」一篇敘述一件時興樣的結婚史，「旺達·察露斯加氏」一篇敘述德國文化與波蘭文化，天主教與耶穌教信仰之衝突，「其父之子」係黎耳根據他比布利禧地方之回憶所寫的一篇短篇小說，「我的權利」敘述荷爾斯坦（Holstein）地方的一件法律故事，「宮堡納依德克」這是黎耳所寫至令人可愛的短篇小說中之一，「老狗」敘述異教裁判官孔拉德·封·馬堡（Konrad von Marburg）時代裏的一件關於異教徒的事故。「人生之謎」的短篇小說集子裏所收黎耳晚年之作，也是範圍至為廣闊的，尤其是「上帝之公道」一篇，敘述兩位互相仇視的弟兄底事故，其範圍之廣闊，簡直可以能結構成一本長篇小說的，「當初無異今日」此篇係以中古情歌時代為背景，「公爵與首相」亦係黎氏至有吸引力作品中之一，這兩篇也是與上一篇相似，而有同等價值的。「我所寫的短篇小說，我時時刻刻都要使牠們簡短緊湊，和音樂

裏頭的序曲一般 (Sonneten)；因爲一篇冗長的短篇小說，並非像人們所說，便是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只不過是一篇結構惡劣的畸形短篇小說而已，「這是詩人自己所說的話，而他這話却是說得對了的。但是「一個全人 (Ein ganzer Mann)」一部長篇小說，這是他於「人生之謎」之後所創作了出來的，却根本仍還是一篇短篇小說，一幅關於一八七〇年的十分優美時代畫像，亦然是有着豐富的，畫時代特徵的言論與筆力，然而却是沒有愈加強烈的行動的，這一點，無論怎樣，是不可以在長篇小說中缺少了的。雖然如此，然而這總不能說，不是黎耳一生著作生涯上的一個堪當的結尾之作的。

利·穆·梅葉氏 (R. M. Meyer) 在他所著「十九世紀之德國文學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一書中，以真正猶太式謙遜慈惠，彷彿明知其壞，而又不肯爲之道破的態度批評黎耳氏，他說，黎耳在他的作品中，雖然不是自己有意，然而却實係爲一種教育目的之所導引。梅氏此言却說得不對，因爲這位詩人借他的小說向我們相示，人生怎樣教育人類，但是一種直接教育的目的，無論作者明知或未經明知，都是他絕不肯要有的。黎耳絕對是一位純粹小說家，他

只爲小說而作小說，並無附帶作用，這也是他自己曾親口說了出來的一句話，而在一位這樣純粹小說家的方面，他也還超越了短篇小說界上同他競爭的各大作家的，就是竟能超越了克萊氏 (Keller) 和孔拉德·菲得南·邁耶氏 (Konrad Ferdinand Meyer)，釋滔穆氏 (Storm)，保爾·海以賽氏 (Paul Heyse)，雖然在藝術家方面，他不見得能敵得上他們。一位真正的小說家絕不會令人在他的作品中感到沈悶無聊的，如果利·穆·梅葉氏在黎耳至佳作品中竟能發現了一定的一種優雅的舊式沈悶無聊時，那這便恰切只是一位腦筋狹隘的猶太人纔能說的話了。至多在黎耳寫作時期較前，而內容關於當前時代之短篇小說中，人們方能這兒那兒逢到一點可以說令人感不到鮮豔趣味的情形的。黎耳底短篇小說，從全體上看，却真彷彿是一部世俗的德意志了，大家須要明白，這說的是世俗的，非宗教的聖經的，這部聖經固然還需要許多其它作品置於其傍，甚至置於其上，但是從全體上看，現時確係難以找到替代之作的。譬如說弗萊達可氏 (Freytag) 所著「祖先們 (Ahnen)」一書，竟還是敵不上他這些短篇小說的。那實在是屬於德國一般可悲哀的現像的，黎耳底短篇小說全集尙未能爲每一優良德國家庭之所俱皆備有。

譯自阿多爾扶·巴台爾斯氏之德國文學史

論維廉·亨利·黎耳氏

